

SHENZHEN LAWYERS



深圳律师

非常视线 专业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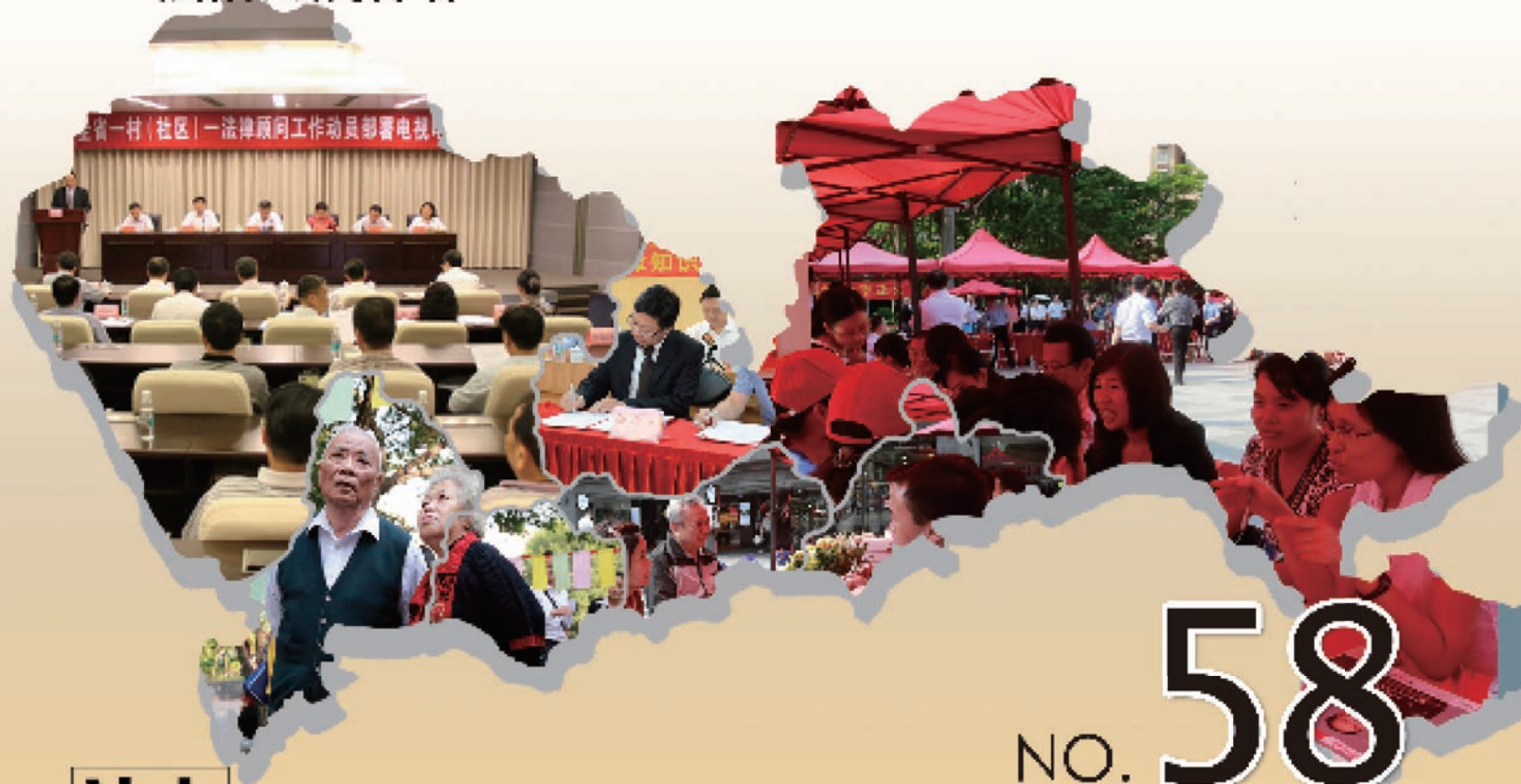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深圳律师在行动

一年来，深圳律师活跃在基层，我们基本实现了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我们基本做到了每周都有律师在社区值班，我们基本做到了为社区基层管理献计献策，我们基本做到为每个社区的居民提供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未来，我们将奉献更多。因为，“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深圳律师没有缺席；因为，“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深圳律师在行动。

创客空间的法律服务初探

法治的践行者



NO. 58

法人
FAREN MAGAZINE

2015年第3期 深圳市律师协会主办
法人杂志社协办

关于征集深圳律师行业 发展历史资料和人物采访线索的通知

各律师事务所、全市律师：

为记录深圳律师行业发展历史，展示律师事业的成就，弘扬律师精神，宣传律师文化，深圳市律师协会将开展口述历史——“深圳律师业回顾与展望”活动。

现面向全市律所和律师征集反映行业发展历程、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实物、图文资料以及人物采访线索，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一）征集年限

2003年之前

（二）征集内容

- 1、深圳首批成立的合伙制、合作制律所、个人所的相关资料（批文、照片、影像、牌匾等）。
- 2、律师制度恢复后首批律师资格证、律师执业证。
- 3、律师代理重大典型案例的相关资料（文字、照片、影像等）。重大典型案例是指在社会上、法律界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 4、深圳律师发展历程中的相关文献、政策文件资料等。
- 5、参与或了解深圳律师业改革发展的代表人物线索。
- 6、其他反映深圳律师行业发展的实物和图文资料。

二、征集对象

- （一）律师事务所
- （二）律师
- （三）其他各界人士

三、征集办法

- （一）征集历史资料的方式包括捐赠原件、原物，或者提供有关史料的复制品、复印件。
- （二）对于人物采访线索我们将进行专访并予以摄像。
- （三）对于征集到的内容我们将择机出版书籍以及制作视频宣传片。

四、征集时间

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

联系人：王颖 刘峰

联系电话：83025728 83025757

传真：83025177

邮箱：szlxxcb@163.com

深圳市律师协会



勇于担当 共建法治

文 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胡宁可

2014年5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这是省委省政府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同时，也为广大律师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在省、市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正确领导和部署下，深圳近二千名律师投身于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中，编写课件、案例和业务指引，开展法律咨询、普法宣传、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维护基层群众的合法权益，化解纠纷矛盾，展现了特区律师甘于奉献、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面貌和执业素养。

深圳律师甘于奉献。早在2002年，深圳律师就在全市开展律师进社区公益行动，十余年的默默奉献，深圳律师为夯实深圳法治城市建设的基石作出了卓著的贡献；2014年8月，800名深圳律师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不计报酬，完成了800份村（社区）法律顾问课件、案例、业务指引的编写；2015年2月，在省司法厅的统一部署下，55名深圳律师远赴河源，克服各种困难，担任和平县、连平县和紫金县部分村（社区）的法律顾问。

深圳律师善于思考。深圳律师务实，更善于在实干中思考和总结。基层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法律顾问？法律服务需求的热点难点是什么？律师该如何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方法？什么样的工作机制更有利于发挥社区法律顾问的作用？这些，都是深圳律师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的问题。这样的思考，已然成为推动深圳市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不断提升和进步的重要力量。

深圳律师勇于创新。深圳律师不空想，思考来自于实践，最终归于实践。开设社区律师微信服务平台，预约服务与定期服务结合，开办社区法律讲堂、社区法治辩论赛，举办法治文艺汇演，人民调解对接仲裁，实行三级联调，律师团队专业分工与协作相结合等等这些务实有效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深受基层百姓和政府的欢迎，让律师的专业服务更贴近百姓，落到实处，收到了实效。

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是党和政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构建科学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而实施的一项民心工程，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把律师作为实施这项工程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律师队伍的信赖和认可。深圳律师，是一支政治可靠、专业精良的队伍，我们将不断探索和创新，将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打造成为政府满意、百姓欢迎的律师公共法律服务新产品，为深圳建设一流法治城市贡献力量。



法人

主办：深圳市律师协会
协办：法人杂志

粤内登字B11277号



本刊随《法人》杂志赠阅发行

编委会 主任	高 树
编委会 成员	张 斌 黄思周 韩 俊 胡宁可 张 鹏 张 弢
主 编	张 斌
执行主编	王 红 张 鹏
栏目编辑	周争锋 俞 飞 陈 伟 杨新发 舒 笑
本期责任编辑	贺 鹏
编辑	刘 峰 王 颖
美编	刘晓莹 赵 佳 周洪磊
电话	0755-83025789 83025728
传真	0755-83025177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1号 时代金融中心20楼
邮政编码	518048
电子信箱	shenzhenlawyers@163.com

视线 VIEW

P4-P7

- 精神病人监管为何频频缺失?
- 二手房交易遇“违约潮”，买方如何面对?
- 律师质疑提高卷烟税程序存在瑕疵
- “免费旅游”谁之过?
- 民警依“法”开枪仍属违法
- “三无船只”载客出事谁应负责
- “死磕派”律师的素质和底线

热点 HOTSPOT



专题：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P8 深圳律师在行动

P10 “五进”社区，把法律服务送到家

P12 律师驻社区为基层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P14 基层法治吹来律师服务新风

P17 调动律师积极性
推进我市村居法律顾问工作

P19 扎根基层 弘扬法治

P22 围绕社区法律需求
创新法律服务模式

P24 “法律顾问进社区”的冷思考

论道 DISCOVERY

P26 创客空间的法律服务初探

P29 爆米花经济
关于影院禁带外来食品的法律分析

实务 PRACTICE

P32 房地产纠纷案件“同案异判”
之原因与规制

P35 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对离婚诉讼的影响

拍案 CASE AND EXAMPLES

P37 物流企业投保类别之利弊

P39 “稻香村”的典型商标异议复审
行政纠纷案分析

人物 PROFILE

P42 法治的践行者

律协动态 INFORMATION



P46 深圳市律师协会
2015年上半年工作亮点回顾

精神病人监管为何频频缺失？

2013年7月29日，一起震惊深圳的惨案发生，男子何某由于精神病发产生幻觉，从家跑到罗湖区贝丽南路附近，持刀砍人致3死1轻伤5轻微伤。该案已于2015年3月在中院开庭审理。2015年7月7日，深圳一名8岁女童李美娇午时被一名陌生女子带走，经公安机关全城搜索，最终在罗湖区黄贝岭地铁站找到了李美娇和那名陌生女子，经调查该陌生女子为疑似精神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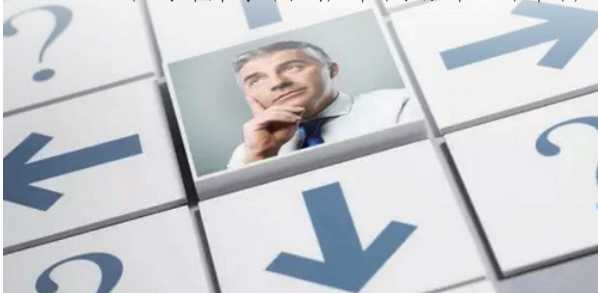
(综合媒体报道)

上述两起报道均与精神病人有关。精神病人从法律上讲，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从事与其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同时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如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实施犯罪行为，可能会免于刑事追责。既然精神病人在法律上享受如此“豁免”之权利，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下，为何精神病人伤人事件的频频发生。

尽管在李美娇失踪一案中，陌生女子并非对其实施身体伤害，但是该事件给失踪女童的家人已带来了精神恐慌，而且也已经成为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另一个案例中的精神病人直接持刀在大街上砍人事件的发生，则将精神病人缺乏监管之后的严重后果赤裸裸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并已给受害人家属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精神病人的监管不仅仅是精神病人家属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责任，政府基层组织尤其是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应当加强对精神病人的监督和管理，从物质、精神等多个层面来对精神病人及其家庭提供更多的帮助。深圳的桥梁、道路越建越多、深圳的绿化等市政设施也越来越好，城市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作为与社会文明程序相适应的精神病院建设、精神病人的治疗与关怀却远远不够。从人性化管理角度来讲，从公益利益出发，政府应当加大精神病人的硬件设施建设，同时应及时制定关于精神病人监管的法律法规，以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监管缺失等问题。

(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 陈伟律师)



二手房交易遇“违约潮”，买方如何应对？

自今年3月30日“二手房买卖新政”出台以来，深圳房价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南山、宝安、龙华等部分热点区域的房价在短短几个月内涨幅达到40%以上，业主为谋求更大利益纷纷毁约，由此引发大规模的业主“违约潮”，进而造成二手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成倍增加。

(综合媒体报道)

据宝安区人民法院的数据统计，自“330”政策出台后，房地产纠纷案件相较同期增长幅度上升108.6%，其中以二手房买卖合同卖方违约被诉居多。笔者认为，卖方违约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随着政策出台以及房价暴涨，业主为了获取涨幅部分的收益和价值，往往将已出售的房屋又委托中介出售，即俗称的“一房二卖”。二是业主想通过“一卖一买”改善自身住房条件，但换房一族自身作为买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被拒绝履行后，为避免无房可住的窘境而不得不对转让自身住房的合同进行毁约，无奈充当“违约与被违约”的角色，这是违约造成的连锁反映。

笔者认为买方（守约方）在购房过程中可从以下两个方面防控风险：

第一，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提高违约成本，以降低卖家违约的概率。深圳地产中介提供的二手房买卖格式合同中，一般约定一方违约赔偿对方双倍定金或房价的20%的违约金，即使法院全部支持守约方主张房价20%的违约金，也不足以弥补房价上涨的损失，虽然守约方可以要求评估房产、主张预期损失，但评估需要预支费用，且会延长审理周期，不利于法院迅速处理。因此，为降低业主拒绝履行合同的的风险，在签订合同时买方可要求适当提高违约金标准，以加重违约成本的方式遏制卖方违约。

第二，一旦卖方出现违约情形，买方应当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申请财产保全。此类纠纷的核心在于对房屋的处理，查封房产是首要事项，一方面可以防止业主高价转卖第三方，另一方面可保证日后判决有财产可供执行。从新政出台后法院作出的裁决看，法院更加注重守约方的权益保护，以维护市场交易的稳定。由此可见，在出现卖方违约的情形下，及时寻求法律救济显得极为重要。

针对卖方在二手房交易中频繁违约、无视合同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必须在司法审判中予以制裁。因为司法裁决的意义，除了解决个案纠纷，还在于重申法律规则，引导更多的当事人强化契约意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保障市场交易秩序与安全。

(广东鑫涌律师事务所 周宁律师 苏婵媛)

律师质疑提高卷烟税程序存在瑕疵

2015年5月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5] 60号），规定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对于提高烟草税税率的法律依据，上述两部委在文件中的表述是“经国务院批准”。这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质疑。韩甫政律师致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要求撤销“财税[2015] 60号”文。

（综合媒体报道）

2015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对包括税率在内的“纳税”有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税率的确定就应当严格依照“税收法定”这一原则执行。现在未经过立法机关讨论就上调税率的做法，备受争议。

“财税[2015] 60号”文发布后，韩甫政律师致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要求撤销“财税[2015] 60号”文。他认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立法法》修改实施后，仍以原通知的形式来调整《立法法》所明确规定的“税率”，此种行政行为不符合《立法法》等法律规定。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以下发通知的形式，提高卷烟消费税率的程序存在瑕疵。卷烟消费税的法律依据是《消费税暂行条例》。该条例只是行政法规，尚未经过全国人大立法。《立法法修正案》第八条第六项明确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显然，按照《立法法修正案》中的规定，包括卷烟消费税在内的“税率的确定”，实行“税收法定”原则，即包括税率在内的“纳税”只能是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绝不能是国务院部委的红头文件（诸如通知等）。根据《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国务院是消费税的征收主体，所以，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应该以修订《消费税暂行条例》的方式，或者由国务院直接发布消费税调整决议来调整消费税。

看来“调整消费税税率只需由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起草意见后上报国务院，由国务院审批通过后，再以部委名义发布”的惯例随着法律的修正需要改一改了。

（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砺律师）

“免费旅游”谁之过？

云南导游陈春燕辱骂游客的视频吵得华夏大地沸沸扬扬，陈春燕因此被吊销执照，砸掉了饭碗，社会舆论亦是一边倒。日前又有丽江网友爆料，游客参加的为1元秒杀“昆明—大理—丽江—版纳”的双飞旅游购物团，购买时即知需要购物。

（综合媒体报道）

随着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出门旅游成了大众度假休闲的主要方式，殊不知旅游其实是一种“奢侈品”。素来崇尚勤俭节约的国人，看到旅行社放出的“六天五夜双飞团低至两千元”的消息就匆匆报了团，以为捡到了便宜，却没有计算机票、酒店、餐饮、景点门票等各项费用是否仅需两千元。到达目的地后导游才告知：或者购物，或者补交费用。这就产生了导游和游客之间典型冲突：这是否是个购物团？

导游认为，团费明显不够开支，游客参团时就应预知要购物；游客认为，旅行社订机票酒店是有优惠的，团费怎么会不够？为什么当初不说明？结果可想而知，导游认为游客“没有良心”，游客指责导游“强迫购物”。

这类问题已存在多年，即使如香港这样的旅游发达地区也只能“治标”而难以“治本”。笔者认为，此类情形双方均有过错，但是主要责任在旅行社。一方面，旅行社实行低价竞争，并以此为噱头吸引消费者，且不说该团需要购物或支付额外费用，甚至将旅行团以每名游客XX元的价格“卖”给导游；另一方面，导游既无薪资，又要承担获取游客的“成本”，他们是只能从游客购物消费中抽成。对此，游客必然不能接受。

我国《旅游法》在2013年就已经颁布实施，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笔者认为，一部好的法律需要有效实施才能维护经济秩序、保障当事人权益。旅游行业不断爆出种种丑闻，旅游主管部门应自检自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规范治理旅行社，要求旅行社主动公布消费情况，如有购物须说明并标清最低消费额度，同时要向民众提供旅游线路参考价位，并特别提示低于一定价位可能存在风险，使双方更加准确把握相关信息，以促进旅游行业良性发展。

（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劲松律师）

民警依“法”开枪仍属违法

2015年5月2日，黑龙江庆安县火车站候车大厅发生枪击事件，徐某因涉嫌暴力袭警，被执勤民警开枪击倒死亡。数日后，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调查组公布庆安枪击事件的民警开枪属于依规合法的调查结论。

(综合媒体报道)

枪声已经远去，事实也已大白，但笔者认为民警依“法”开枪所依之“法”本身属于违法，且因所依之“法”不具合法性。

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且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无权就“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作出决定，只能以法律形式进行制定。依照“举轻以明重”的当然解释，剥夺公民生命的强制措施比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更甚，故剥夺公民生命权的强制措施已包含于上述法条的内涵及外延当中。

“如果说一次违法的执法只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违法的立法就是污染了整个水源”。综上所述，《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等规定存在立法时间久远且缺乏立法权限、超越立法权限、效力位阶与立法法规定相矛盾、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同法律相抵触或者法规之间、规章之间、法规与规章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冲突的现象。

民警开枪权作为警察权来源于国家公权力，故此，民警开枪权应遵循公权力“法无明文不可为，法无授权不得为”的原则。就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调查组依据《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和其他现行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认定民警开枪属于合法的结论，是违反《立法法》规定的，这也间接导致民警依“法”开枪仍然属于违法。

法治的规则性亦称合法性。民警开枪权只有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且依法行使才能保障国家立法的统一和尊严、规范公共权力秩序、保护公民基本人权并实现法治的规则性。

(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 张原辉律师)



“三无船只”载客出事谁应负责

日前，阳朔县兴坪镇渔村村民赵某，用生产自用排筏搭乘游客熊女士等3人到漓江观光。赵某开着排筏来到兴坪镇渔村段漓江水域时，与一艘返航的旅游空船相撞。排筏上4人全部落水，3人被及时救上岸，1人失踪。事发后，阳朔县政府组织公安、海事、安监和乡镇等相关部门赶到现场施救和处置，公安部门已控制赵某。

(综合媒体报道)

据了解，赵某所开的排筏不具有搭载游客观光的资质，排筏上也无救生衣等安防措施。经搜救人员全力搜救后，于次日打捞出—具遗体，经家属确认，死者就是失踪的游客。

笔者认为，首先旅游景区的游船营运需获得营运证，并附有救生设备的安全监管，应由景区管委会负责安全监管。一旦出现事故，应追究景区管委会的责任；景区若违反规定，实行非法营运游船，安全监管应由交通部门监管，出现重大事故的，应当追究景区管委会事故责任，追究旅游局和交通部门的监管责任。

而阳朔县兴坪镇渔村村民是用生产自用排筏搭乘游客观光，所开的排筏不具有搭载游客观光的资质也并未挂载在任何的旅游公司，属于自己非法运营和使用非法船只载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渔船、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快艇和简易泡沫筏等船只非法载客行为将依法从严查处。

赵某等于是私人违法载客，并且未按照水上交通法在船只上安放救生衣等安防措施，出现突发状况后无法及时有效的采取救助工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集聚在景区周边的各种游船，长期非法停靠载客，除了扰乱正常的景区秩序，对漓江的水运和客运安全是极大的隐患。配备救生衣的要求形同虚设、客运运输资质未严格审查，这些乱象层出不穷且得不到有效监管，如何保证漓江游船的安全呢？

笔者认为，赵某承担事故责任毋庸置疑，但更希望相关部门对“三无”船、竹筏等船只从事非法载客行为进行全面治理，否则乱象丛生既影响了旅游景区健康的发展，也无法杜绝悲剧再次上演。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王彬斌律师)

“死磕派”律师的素质和底线

文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杨新发律师

近年来，律师界涌现出一批“死磕派律师”，死磕派律师活跃的身影也成为律师界一道独特的风景。对于死磕派律师，律师同行有赞有弹，社会舆论有褒有贬。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死磕派律师应当受人尊敬。而公众之所以对死磕律师的评价褒贬不一，根本在于把那些缺乏法治和道德底线的讼棍律师、冒充律师的社会盲流归入死磕派律师行列，使死磕派律师蒙受污名。

在笔者看来，“死磕派律师”是一种荣誉，而要成为“死磕派律师”，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必须坚持法治和道德的底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担当得起“死磕派”这个称号，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死磕派律师是法治建设的捍卫者和推动者。

死磕派律师必须对法治有坚定的信仰。毋庸置疑，中国还处在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还很严重，律师的执业充满着艰辛、煎熬和风险。但法治毕竟是所有法律人共同的图腾，也是全体国民共同的彼岸。“死磕”必须是为公平正义死磕，必须为法治理想死磕，死磕的对象必须是法治建设的拦路虎和绊脚石，死磕必须是依照法治的精神、遵循法定的规则和合法的途径。

因此，死磕派律师必须对法治有宗教般的虔诚和死士般的坚毅，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只有那些为了法治的理想能够受得了委屈、挨得起摔打、经得起磨难而不改初衷仍坚持奋斗的律师，才当得起“死磕派律师”的荣誉。至于个别律师为了博取名利而罔顾事实和法律规定，则属于没有法治信仰的投机分子，属于律师界的害群之马，也是妨碍国家法治建设的绊脚石，不但没有资格称为“死磕派律师”，反而应成为死磕派律师死磕的对象。

死磕派律师必须有高贵之气而无凉薄下流之德。死磕派律师本身必须是遵纪守法、道德纯良之辈，方有死磕的底气。因为本身私德无亏、行事严谨，自然不会表现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猥琐，而会绽放出从容淡定、宠辱不惊的华贵，使人崇敬有加。

笔者曾经有位朋友也是死磕派律师，因为坚持为市民维权状告某市政府而遭嫉恨。在要求吊销该律师执业证被抵制后，有关部门对该律师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查，但没有发现该律师有任何的违法行为和不良嗜好，其表现出的品德纯良令调查人员深为感叹，最终不得不

放弃继续调查。如果律师本身德行有亏或者有违法犯罪行为，自全尚且不可，岂能保全他人？无私方可无畏，自己德行有亏，又怎敢跟嚣张跋扈的滥权者掰腕子、下战书？如果热衷于死磕的律师本身德性凉薄、手段下流，一经攻击即土崩瓦解，徒增笑柄，又哪来死磕的底气和继续死磕的机会？

死磕派律师必须有精到的专业水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死磕派律师是法治森林的啄木鸟，也是为法治建设治病救人的良医。如果没有精到的专业水准、没有全面而精深的专业素养，很难戳到权力滥用的痛处，很难在具体案件中提出有针对性的抗辩意见，其攻击力会轻轻松松被化解为无形，死磕不成反被磕死。还是以前述的朋友为例。该律师死磕到底的劲头令法官、检察官们深为头痛，但是该律师从不信口开河，提出的意见必定是有理有据、难以辩驳，以至于司法机关领导专门告诫法官、检察官要特别认真对待该律师承办的案件。这种死磕，在客观上促进了司法的公正和进步。反观有些所谓的“死磕派律师”，连话都说不利索，就是这样够不上普通律师标准的人，能够拿得出令权力滥用者低头的武器？能够赢得法官、检察官的尊重和信服吗？能够激起公众如滔滔江水的敬仰？

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有些权力滥用者还在张牙舞爪的今天，死磕派律师是值得珍视的稀有品种。无论环境多么的复杂、无论境况多么的险恶、无论事业多么的艰难，他们始终坚持对法治的信仰，始终坚守道德和法治的底线，不做怨妇式的吐槽、不做泼妇式的谩骂、不做情妇式的撒娇，既不随波逐流，更不同流合污，才配得上“死磕派”律师的名号。

真正意义上的死磕派律师必须是法治建设的捍卫者，有死磕到底的精神，但有理有节，既注重死磕的方式方法，又讲究死磕的效果和影响，以不破坏社会稳定、不损害法治秩序、不践踏社会道德为死磕的底线。

因为死磕派律师的存在，我们的法治建设的步伐将更稳健、我们法治建设的根基将更牢固。死磕，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担当；死磕派律师，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面旗帜。



HOTSPOTS | 热点——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急先锋，紧跟省委、省政府、省司法厅的统一步伐，积极参与全省统一部署，深入开展各项改革，在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推进基层民主法制进程中，开创了属于深圳律师的新篇章。

一年来，深圳律师活跃在基层，我们基本实现了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我们基本做到了每周都有律师在社区值班，我们基本做到了为社区基层管理献计献策，我们基本做到为每个社区的居民提供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未来，我们将奉献更多。因为，“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深圳律师没有缺席；因为，“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深圳律师在行动。

深圳律师 在行动



文 本刊编辑部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各项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区，社会矛盾多发，群众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如何较好地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广东省委省政府充分认识到法治在解决一些较为紧迫社会问题中的作用，同时也认识到律师作为一种专业的独立群体，在这一领域发挥的独特作用。早在2005年，广东省就已经进行了系列基层法治治理试验，不定期组织律师到农村和社区中开展普法活动，帮助化解村居邻里纠纷；2007年组织农村维稳律师服务团下乡入村居；

2012年，组织律师事务所与镇、街司法所“所所结对”，发动律师到乡村和街道社区开展公益法律服务。近年来，各地进一步将法律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探索法律顾问进村居的治理新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省委省政府于2014年5月5日联合发文以建设幸福村居为目标，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作为“1号工程”，组织执业律师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急先锋，紧跟省委、省政府、省司法厅的统一步伐，积极参与全省统一部署，深入开展各项改革，在创新基层社会管

理，推进基层民主法制进程中，开创了属于深圳律师的新篇章。

2014年5月，市律协组织20余名律师参加由省律协举办的村（社区）法律顾问培训会议，学习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一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和省司法厅《关于开展一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实施方案》，深入理解“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的内涵，提高律师服务基层、服务社区的工作能动性。

2014年7月2日，市律协就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系列活动“弘扬法治 共筑梦想 法律服务进村（社区）公益活动”征集论文。

2014年8月，市律协正式成立“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指导小组”，深圳市司法局局长担任组长，市司法局副局长、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担任副组长。

2014年8月，市律协动员25家市属律师事务所、35家区属律师事务所，共计720人次参加普法教材梳理工作。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完成411件普法课件、368宗案例、48个指引的汇编工作。

2014年9月，市律协面向全市律师招募法律服务进村（社区）现场法律咨询活动志愿律师。由省律协主办、市律协承办的“弘扬法治、共筑

梦想—法律服务进村（社区）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顺利召开，深圳80名律师深入社区群众当中，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

2014年12月11日，市律协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统一部署，公开选拔55名律师对口支援河源市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深入村（社区）担任法律顾问，确保此项工作全面落实。

2015年1月，市律协组织召开社区法律顾问经验交流会，对2014年度“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组织进行表彰。

2015年5月，由市司法局、市律协共同组织的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培训会议在河源市召开，我市傅立标律师介绍了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在河源市开展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的经验。

2015年5月，广东省第一届律师行业业务技能大赛在广州举行，我市曾迈律师、林荣律师分别荣获此次大赛法律顾问项目一等奖、二等奖。

2015年6月全省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现场推进会在珠海召开，市司法局党委书记蒋溪林、市律协会长高树参加会议。

2015年6月15日，市司法局、市律协在市律协多功能厅联合召开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推进会”，就进一步做好深圳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进行部署。

一年来，深圳律师在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的工作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专业律师团队，他们紧密围绕社区法律需求，创新服务模式，取得良好社会效应。龙华新区律师签约入驻社区率达到100%，实现“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全覆盖，并通过网络、微信等方式与社区法律服务平台对接，及时为社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肖迎红律师团队结合社区实际情况，编写《如何做个好房东》、《如何做个好管家》等课件，面向出租屋业主、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进行宣讲，从源头上减少发生纠纷的隐患。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李慧律师团队积极配合政府维稳，在处理一起物流公司（因破产）而引发的债务问题时，面对数百名群情激昂的上访群众，律师们从容应对，分组进行疏导，引导他们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从而有效的化解了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受到了政府的高度赞誉。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傅立标律师团队选派多名律师进驻河源，把法律带进村社，他们在工作中注重培养村社干部的法制观念，引导村社干部在工作中尽可能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改变了村镇管理工作中仅以“行政手段”处理问题的传统做法。

一年来，深圳律师活跃在基层，我们基本实现了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我们基本做到了每周都有律师在社区值班，我们基本做到了为社区基层管理献计献策，我们基本做到为每个社区的居民提供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未来，我们将奉献更多。因为，“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深圳律师没有缺席；因为，“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深圳律师在行动。



可以说“一社区一法律顾问”项目是“司法为民”理念的有益探索与实践，该项目“一落地便生根”，受到辖区居民的广泛欢迎。居民有纠纷，可以在社区寻求法律服务，而不必舍近求远，增加法律维权的成本。随着“一社区一法律顾问”有序推进，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以实现。

正所谓“法有限而情无穷”，在“一社区一法律顾问”项目推进的过程中肯定会碰到新情况、新问题，但我们有信心攻坚克难且知难而进，将工作持续推向前进并夺取新胜利！

“五进”社区

把法律服务送到



文 深圳市律师协会福田区工作委员会



作为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前沿，深圳肩负着为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重大使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深圳提出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和前海开发开放战略平台建设这“三化一平台”改革主攻方向，调动社会各界资源，加快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的步伐。

福田区作为深圳市的中心城区，区政府积极响应深圳市打造一流法治城市的号召，全市241家律师事务所、5750名律师的办公地址聚集在此，

为福田区深入贯彻落实建设“一流法治城市”提供了丰富的律师服务资源。福田区司法局和相关职能部门积极与深圳市律师协会协调，对司法调解制度等作出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包括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调解”福田模式，创新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2015年3月17日，福田区司法局举行街道社区与律师事务所签约仪式，标志福田区95个社区与34个律师事务所结对服务签约全面完成，实现了全区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全覆盖。

自2003年开始，福田区率先在莲花街道景田社区开展律师进社区试点工作，以点带面，逐步引进律师事务所投入基层司法工作体系，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凭借律师的专业和职业优势开展基层法制教育、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

为助力法治福田建设，福田辖区街道从基层实际出发，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开展法律“五进”社区工作，把法律服务送到了老百姓“家门口”，营造社区居民学法、懂法、守法、

用法的法治环境，弘扬“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维护权益靠法”的法治文化，着力建设法治家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法律“五进”社区，具体言之：一是法律宣传进社区，创新“立体普法”新载体。除创办《法律进社区》报纸外，莲花街道、华强北街道等还依托社区老年协会、书画社、歌唱团等社区组织组建法律宣传服务队，编排法治文艺节目，创作法治文化作品，举办法治文艺晚会，开办法治文艺展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法律宣传。法律服务站根据社区居民的法律需求，每月组织一次专题“法律大讲堂”。去年以来，共组织“法律大讲堂”240余次，专题法律宣传活动60余场，法律宣传覆盖9万余人。二是法律咨询进社区，拓宽“学法用法”新渠道。各街道法律咨询服务包括24小时电话咨询、法律专员日常咨询、律师定时咨询、大型活动集中咨询以及针对重点、疑难个案，法律服务站定期组织挂点法官、律师、社区民警等进行“会诊式”咨询等。自去年以来，莲花街道、华强北街道等各法律服务站共提供法律咨询服务3950人次。三是法律代理进社区，构建“互惠双赢”新格局。法律代理进社区是引导社会法律力量积极参与社区法治建设的创新举措，社区居民不出社区就可享受到放心、优惠的法律代理服务；律师事务所也可借此加强自身宣传，丰富自身案源，互惠双赢。四是法律援助进社区，开通“绿色通道”新捷径。2012年7月，莲花街道率先获得法律援助审批授权，将法律援助服务延伸到社区，确立了社区受理代办、街道集中审批、律师全程参与的工作模式。五是法律调解进社区，建立“三级联调”新

模式：其一、实行“前端调解”。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法律服务站设立调解窗口，配备1名专职调解员。社区法律服务站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发现矛盾纠纷苗头的，及时转交并配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其二、实行“联合调解”。社区法律服务站与驻辖区派出所、医院等单位调解室建立热线联系，协调解决相关法律事宜，对重大纠纷进行联合调解共同处置。其三、实行“深入调解”。街道各有关部门加强与社区法律服务站的协调联系，借助社区法律服务平台及早发现和化解问题，主动派员深入社区法律服务站解决重大矛盾纠纷。不完全统计，去年以来福田辖区各街道法律服务站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708宗，化解重大涉法事件29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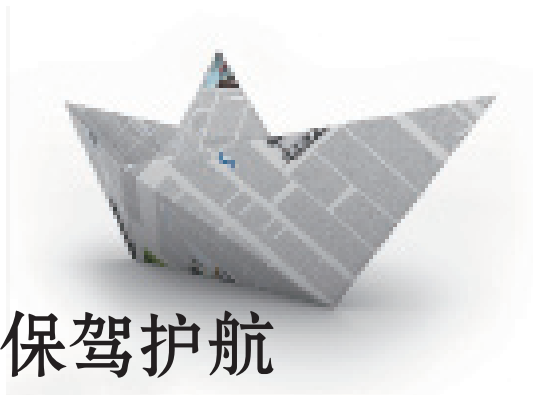
可以说“一社区一法律顾问”项目是“司法为民”理念的有益探索与实践，该项目“一落地便生根”，受到辖区居民的广泛欢迎。居民有纠纷，可以在社区寻求法律服务，而不必舍近求远，增加法律维权的成本。随着“一社区一法律顾问”有序推进，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以实现。

有鉴于此，福田区高度重视引进和组织社会力量和专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服务基层群众。在司法行政系统，长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律师进社区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辖区律师广泛介入基层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法制宣传和依法治理等业务，已成为了基层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

正所谓“法有限而情无穷”，在“一社区一法律顾问”项目推进的过程中肯定会碰到新情况、新问题，但我们有信心攻坚克难且知难而进，将工作持续推向前进并夺取新胜利！



律师驻社区 为基层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文 深圳市律师协会南山区工作委员会

作为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基地，2014年，南山区实现本地生产总值3520亿元，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3787件，占全市的34%；新增上市企业4家，总数达109家，占全市的37%；战略性新兴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提高到70%，进一步彰显南山区“中国硅谷”的称誉。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我们不能忽视律师的身影。

8个街道办事处，100个社区，47家律师事务所，490名律师，进驻社区开展法律顾问工作的律师达177人，占到全区律师人数的近40%。2015年7月，南山区170余名律师正式签订社区法律顾问服务合同，进驻村（社区）为街道、社

区、企业、居民提供法律服务。人数虽少，比重却不低，全区近一半的律师与每一个社区紧密相连，这是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数据。而这一切，基于良好的工作机制和严格的管理体制。

自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的有关文件以来，深圳市律师协会南山区工作委员会即刻与南山区司法局联合召开南山区律师事务所主任（负责人）工作会议，广泛听取各律师事务所对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探讨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的工作开展模式，务必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经过研究探讨，我们形成了由律师对接村





（社区），定点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模式，并制定双向工作机制：每个社区安排两名律师轮流值班，对不能达到工作要求的律师实行淘汰制。为了保证驻村（社区）法律顾问的服务质量，我们对进驻村（社区）的律师进行了选拔：秉承报名为主，选派为辅为原则，组织一百余名律师成立南山区法律服务团，并组建了政府行政、知识产权、社区校园、公司商务等10个法律服务小组，有针对性的提供服务。

针对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区进驻有众多科技公司，诸多年轻的创客也在南山区安营扎寨的情况，南山区工作委员会公司商务组、知识产权组因地制宜地设计了服务方式，在南山高新技术园区开展知识产权、电子商务、公司运营方面的法律知识、风险防范的交流、培训，为有需要的公司及个人提供法律服务。尤其是针对年轻创客，南山律师积极参与南山区政府举行的各项活动，与创客们交朋友，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为创客公司的设立、经营管理、股权设计、法律风险防控保驾护航。

社区校园组多为细致有爱心的女律师，她们在社区定时定点提供法律服务外之外，还时常进驻社区、校园，普及婚姻家庭、民事商事、未成年保护等法律知识，提高社区居民及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增强其法律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当下社会，校园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社区校园组的律师针对初、高中生的年龄特点，走进中学校园，为老师和同学讲解青少年犯罪心理、犯罪行为、犯罪后果、犯罪预防等，让未成年人用法律意识、法律知识武装头脑，预防犯罪，健康成长！目前，社区校园组正在积极与学校沟通、联络，希望能做到每个学校

都有一到二名律师定点提供法律服务，便于学校有法律需求时第一时间联系律师。

一年来，我们取得了一点成绩，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南山区律师人数较少，南山区律师之间、南山律师与其他区律师间交流少，参与意识不强，目前在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中参与的力度和方式尚待提高。另一方面，当前南山区部分社区没有接到省、市司法局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相关文件，对律师进驻村（社区）的举动尚不理解，认为是律师是以拓展业务为目的，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因此，律师主动进入社区尚有一定难度。

鉴于此，我们期待市司法局、区司法局就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制定统一的文件指引，下发各区局、街道、社区，让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的精神深入到基层；期待省律协、市律协就各区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开展加强沟通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让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法律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开展推动了南山区法律服务团的成立，加强了南山律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打破了以前律师各自为政、个体单干、律所间缺乏交流的局面。我们愿意团结在一起，以法律服务团成立为契机，加强南山律师交流、提高专业技能、增强服务意识；我们愿意积极走进南山区政府机关、公司企业、社区校园，开展咨询、培训、交流活动，为有法律需要的南山各界提供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为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中奉献绵薄之力；我们愿意携手共进，互励共勉，树立南山律师诚信良善、专业敬业的正面形象，开创南山律师崭新局面！

律师是一个自由度很高的职业，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个性”，同样，每个律师所擅长的领域也各不相同，这就导致了一些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中会遇到律师不听“指挥”、工作难以开展、工作时间难保证、律师单打独斗、遇到疑难案件时仅凭一人之力无法解决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律师事务所信誉度降低，律师整体形象受损。对此，罗湖律师采取团队化运作模式，很好的避免了这些问题，有效弥补了律师个人时间不确定、素质不统一的缺陷，真正做到了律师法律服务“不缺席”、“不缺人”。

基层法治

吹来律师服务新风

文 深圳市律师协会罗湖区工作委员会

2014年5月16日，广东省司法厅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的工作方案》的通知，标志着广东省“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这一工作全面展开，律师队伍向各个村（社区）全面进发，他们从高档的写字楼、肃穆的法庭走上街道，走进社区，走入基层群众中间。律师们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开展法律咨询、普法宣传、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等活动，依法帮助群众维护合法权益，化解纠纷矛盾，增强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

罗湖区司法局成立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指导小组，具体负责一社区一法律顾问的推进和组织协调工作，及时收集、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指导街道司法所和律师事务所开展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司法局公证律师管理科。

深圳市律师协会罗湖区工作委员会在罗湖区司法局的指导下，积极响应、号召和执行“一村

（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做好统一部署。配合司法局制定了法律顾问工作方案，明确了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法律顾问工作职责、工作机制等。组织了20多家律师事务所，数百名律师参与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

罗湖律师长期致力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良法律服务，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中做出了一些成绩，涌现了一些优秀的服务单位。其中，广东普罗米修斯律师事务所结合多年以来服务东门商圈的法律顾问经验，在“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原则与精神指引之下，创新服务模式，进一步为笋岗、东门街道部分社区提供顾问服务；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派驻律师、党员进入桂园街道桂木园、洪围、红岭等八个社区，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先后与福田、罗湖十余个社区签订了法律顾问协议，并与河源市和平县四个镇共35个村对接，为五十余万群众提供法律

服务。罗湖律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特点，不断创新发展。

创新服务模式 完善管理制度

律师是一个自由度很高的职业，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个性”，同样，每个律师所擅长的领域也各不相同，这就导致了一些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中会遇到律师不听“指挥”、工作难以开展、工作时间难保证、律师单打独斗、遇到疑难案件时仅凭一人之力无法解决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律师事务所信誉度降低，律师整体形象受损。对此，罗湖律师采取团队化运作模式，很好的避免了这些问题，有效弥补了律师个人时间不确定、素质不统一的缺陷，真正做到了律师法律服务“不缺席”、“不缺人”。

团队运作，化零为整。

统一领导，律师服从调配。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启动后，罗湖区属律师事务所迅速成立以所主任为组长，全体律师为组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全力支持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在组长的领导下，律师事务所是一个团队，每个律师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一名队员，在工作上必须接受统一的调配。村（社区）居民在接受我们的服务时，享受的也不再是一个单独律师的服务，而是一个团队提供的高品质和高效率的服务。

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律师服务。针对罗湖律师服务的村（社区）的实际情况，在罗湖区工作委员会指导下，罗湖各律师事务所结合本所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律师进村（社区）法律服务实施方案》，由律师事务所政府法务部牵头，将工作落实到了每一个负责具体工作的律师和律师助理，并且根据村（社区）矛盾纠纷数量的数量及难易度，结合律师的工作经验和特长，合理分配律师挂点村（社区）。在日常的服务中，团队内分工合作，保证服务时间和效率，

一旦遇到重大疑难法律问题，律师上报律所，由团队集体讨论得出统一意见，确保为村（社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制度规范，厉行奖惩。

在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期间，罗湖区各律师事务所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与教训，确立较为完善的工作制度，为更好的开展法律顾问工作保驾护航：

实行定期服务与常态化走访相结合的制度。辖区律师事务所定期指派律师到村（社区）调研，定期开展法律咨询，法律讲座、法律宣讲会等活动，以满足村（社区）居民多重需求。

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积极到群众中去，主动了解群众反映的热点、焦点问题，开通“嘉得信——社区法律服务”微信平台，提供每日16小时在线免费咨询服务，切实为社区提供便民法律服务。

实行“服务到底制度”。针对村（社区）出现的疑难纠纷和矛盾，有些耗时长、历史久远等特点，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采取服务到底的模式，律师驻扎村（社区），帮助群众及时妥善处理纠纷，并适时回访，询问服务结果。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将“灌输式”转变为“按需式”法律服

务，社区居委会或居民根据自身的法律需求，填写《法律服务预定表》，向法律顾问预定法律服务。法律顾问依此为社区和居民量身定做服务方案，提供法制讲座、法律培训、个案分析、调解纠纷和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此外，派驻律所还在社区开展“明辨是非”大讲堂，以辩论的方式，就征地拆迁、土地权属、婚姻家庭、社会保障、高空抛物等焦点问题进行法律宣讲，取得良好实效。

严格力行奖惩制度。“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对于律师而言是一项严肃而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进驻的律师事务所对每位参与法律顾问工作的律师都有严格要求，要求他们必须严格遵守法律顾问的义务，如在自己的服务村（社区）范围内出现重大案件没有上报，导致严重后果，将对其进行严格处罚。而对于表现优异的律师，派驻律所也将及时给予其物质和精神奖励，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建立村（社区）工作日志与档案制度。社区法律顾问制作社区法律需求账本和专门的工作日志，梳理分析各社区的矛盾纠纷，详细记录律师在村（社区）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况，并按照规定整理成档案，以备总结和检查村（社



区)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

创新模式，充分利用第三方法律服务机构

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通过引入仲裁机制，让有影响力的仲裁员主持处理纠纷，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由当事人通过自愿协议的方式自由地处理争议，并可申请仲裁委直接裁决确定法律效力。派驻律所还主动与村(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对接，参与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协助调解组织加强人民调解员的组织建设和专业培训。通过派驻律所的积极沟通，桂园街道办成立“桂园街道仲裁办公室”，引入仲裁机制，充分实现小纠纷不出社区，大纠纷不出街道，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调处，在有效引导居民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诉求的同时降低法院诉累。

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进驻和平县时，了解到每个村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便主动与驻点村的调解委员会进行对接，协助化解重大复杂矛盾纠纷，引导当事人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派驻律所根据深圳在人民调解方面的工作经验，向当地司法局建议加强驻村人民调解员的经济补助和队伍建设，扩大人民调解队伍，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素养和专业技能。

律师服务进基层 村居法治树新风

在为社区群众提供常规法律服务的同时，律师事务所协助做好村(社区)的自治管理。律师事务所帮助进驻村(社区)审核、修改村(社区)自治组织章程、村规民约及其他管理规定，协助村(居)“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健全村(居)委会各类民事经济合同和处理信访案件提供法律意见，参与村(居)委会“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引导纠纷当事人依法理性表达诉求，推动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入驻的和

平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是广东省著名的贫困县，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当地居民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对于律师入驻村(社区)抱着怀疑的态度，随着我们律师工作的逐步开展，居民对律师的信任逐渐加强，“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受到的良好实效。

一是让法律服务在村(社区)内基本实现了全覆盖，群众不出村(社区)即可享受到法律服务，困难群体能够及时得到法律援助，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自“一村一法律顾问”活动开展以来，该驻村(社区)律师共参加法制宣传活动110次，参与村(社区)委会、小区业委会重要规章制度的起草、修改和审核22次，为村(社区)提供法律意见70余次，接听接受群众各种法律咨询700余人次，参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20起。这些法律服务，为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保障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引导他们采用合理合法的途径表达诉求，有力的维护基层的和谐发展，为派驻律所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效益。

二是让基层干部群众法律意识明显增强，逐步养成知法守法、依法办事良好习惯，解决矛盾纠纷。

20世纪90年代，和平县热水镇政府、河源镇政府的供电站向中国农业银行和平支行多次借款，部分借款由热水镇政府、河源镇政府作为保证人，2015年3月23日中国农业银行和平支行起诉镇政府、供电站要求归还借款。

在驻村律师介入前，镇政府希望通过和解解决纠纷。后派驻律所两名律师分别于4月22日、4月29日前往热水镇政府、河源镇政府针对该问题向他们提供了法律意见。律师解释道：根据担保法的规定，镇政府不是合格的担保主体，而且本案的诉讼时效已过。镇政府相关领导听了律师的法律分析后决定委托律师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该纠纷。2015年5月4日作为河源

镇政府、热水镇政府的代理律师分别出席了案件的开庭审理。驻村律师在此案中对基层领导的普法收到实效，阻止了国家财产的流失，推进了法治基层工作的开展。

三是帮助引导了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表达利益诉求和解决矛盾纠纷，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了村(社区)的和谐发展。

河源镇政府塘尾村欲将坐落在本村黄狗坳林场向本村村民招标，该村的村委主任叶主任联系驻村律师希望能提供一些法律意见

2015年4月30日，律师前往该村，但是部分民众对“外人”抵触情绪很强烈，现场秩序混乱。面对这些情况，律师首先向村民进一步表明身份，声明他们是响应广东省“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的号召，入驻该村的公益律师，以化解纠纷为导向，将始终站在法律的角度，保持中立。其次，律师介入山林权招投标，主要目的是帮助村民审查内容是否合法，程序是否规范，把控风险，以防成为无效的招投标，帮助村民节省了人力和财力。最终村民接受了律师的法律意见。

展望

随着“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的开展，任何一名参与其中的律师都应该感受到身上的重担，律师在这项工作中肩负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这项工作能否做好不仅关系到服务辖区内广大群众的利益，还影响到普通群众对于律师这一群体的印象，如果没有完成好，受损的不仅是个人的名誉，还会破坏整个律师行业的形象。因此，罗湖区律师工作委员会将带领全区律师，秉承“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扎扎实实为百姓办实事”的理念，将群众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律师在村(社区)中作用，更好的服务于群众，服务基层法治建设。

调动律师积极性

推进我市村居法律顾问工作



文 深圳市律师协会龙岗区工作委员会

深圳自2004年实施城市化改制以来，村委会改制成居委会，村集体经济全部按《深圳市股份合作公司条例》，改制为股份合作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原来的村表面上已不存在了，但其实这些村的村民（现在的“居民”）仍脱离不了农民的特色。大部分股份公司有一定的法律意识，也有能力聘请法律顾问，他们对村居法律顾问的期待更高，要求更严。而深圳的村居法律顾问工作要接深圳的本土地气，要吸纳优秀律师参与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必须有更好的适应深圳本土的政策。我们认为，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中关于工作的开展方式大部份是合理的，如果能够切实落实意见的指示精神，全省的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必将开展得有声有色。但是深圳的村居，与全省其他地市相比又有其特殊性。现提出几点思考意见，希望对深圳的村居法律顾问工作有益。

改进村居法律顾问的推荐介绍办法，可由律师主动联系社区，或由社区主动确定人选后上报主管部门。主管部门转变职能，由主导招投标转为监督工作实效，弱化政府行政行为。避免摊派、拉配现象。

依照相关文件，是主管部门建立桥梁、社区主动选择法律顾问，可是在实践中个别区主管部门直接以招投标的方式购买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不论服务对象地处偏远还是闹市，在符合招标要求的基础上，价低者得。这样一竿子到底，就把很多有热心有能力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中小律所的律师给挡在门外。社区没有选择法律顾问的自主权，只能由主管部门分配下乡，把社区自己满意的律师直接给剔除出该项活动。

在村居法律顾问的人选上，重视退休老律师的作用。允许律所聘请本地或内地退休律师专职负责村居法律顾问工作，一名退休律师原则上负责的社区不超过5家。亦可由一个律师团队或律师事务所为单位，对口若干社区，而不是由固定一个律师负责某一个或几个社区。

执业年限长、执业经验丰富的律师前辈是我们行业的宝贵财富，无疑也是开展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力量。老律师工作责任心强，职业素养高，更有利的是工作压力相比年轻律师较小，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村居法律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允许各律所聘请这些律师参与到这项工作来，

发挥他们的积极正面作用。

事实上,自去年5月全省开展村居法律顾问工作以来,某一村或社区完全依赖某一个律师有效处理全部法务工作的,少之又少。有的社区反映某一问题咨询到政府安排的法律顾问,顾问律师回答“我只懂某一方面的法律问题,这方面不熟悉”。若由整个律所或律师团队协同作战,这些因擅长领域不同而留下空白知识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只有社区对顾问的工作满意了,社区法律顾问工作才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放宽对律师服务时间的考核,凡是顾问律师处理因与社区有关的事务,都应计入台账,计入省里文件中所要求的服务时间。凡是律师参与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的活动的,只要涉及到本社区的,均应计入服务时间。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的相关文件要求每个月每位村居法律顾问服务时间不低于8小时,遗憾的是深圳某些区在村居法律顾问的招标文件中赫然标注“每个星期不低于8小时服务时间”。这样的要求完全“不接地气”,在落实中很难成为现实。相反,很多社区法律顾问即使没在社区值班,也在从事与社区有关的法务工作。比如:律师下本社区企业调解案件,律师参与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等与社区有关的事务,律师本人未到达社区,却花了大量的时间草拟审查社区的各类法律文书。

村居法律顾问的工作内容千变万化,形式多种多样,村民半夜打电话咨询法律问题都是常有的事

情。相关应当肯定律师的积极作用,而不对律师的服务时间拘泥于定点于社区。诸如电话解答法律咨询的时间,也应计入顾问律师的服务时间。

允许村居法律顾问在完成要求的工作时间、工作量以外,在服务对象自愿的前提下,参照我市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向当事人收取律师费。

律师的公益心值得提倡,深圳很多律师长期以来不计名利参与公益,但是全省村居法律顾问这项工作长期靠律师的公益心来维持,明显是不足的。律师的服务价值逐渐得到社会、当事人所认可,在当事人遇到特别的案情时,愿意聘请自己信任的律师帮助自己处理法律事务。笔者认为,政府也应当顺应这种思维,使律师得到与其服务对等的经济价值,

如果村居法律顾问对相应的社区倾心服务,与社区及社区居民建立了难得的信任基础,所花费的时间成本绝不是相关文件中要求所能达到的。受众的信任是村居法律顾问事业成功的最坚实的保障,主管部门应当以多种方式鼓励参与这项工作的律师,倾听民情民意,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尊重双方意愿,允许律师在规定的服务时间以外可以收费,收费范围包含:法律咨询、代书法律文书、代理诉讼案件、代理调解等等。

深圳有一支近9000名讲政治顾大局能战善战的律师队伍,多项全国创新的新举措,至今仍是其他省市同行学习的榜样。相信在全省村居法律顾问这项工作中,深圳律师同样会开创出农村城市化后的先进经验,为社区办好事、办实事。



管仲曾说：“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建立健全的工作制度能使“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的核心价值观要求进一步细化，落到实处。“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开展伊始，宝安区有关部门就制定了相关的工作制度，石岩街道更是出台了《“一社区一律师”实施方案》、《“一社区一律师”工作考核办法》，进一步明确律师参与“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细化社区法律顾问的遴选退出、经费保障等实施细则，形成了规范“一社区一律师”工作的长效机制。

扎根基层 弘扬法治

文 深圳市律师协会宝安区工作委员会

2014年5月，广东省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推进基层治理新模式“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2015年是宝安区“全面深化改革年”和“法治城区建设年”，恰逢宝安区“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全面铺开，社区法律顾问成为宝安区基层社会管理尤其是基层的法治建设的新动力。近年来，宝安律师以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在处理劳资纠纷、为行政部门排忧解难、为群众办实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深得政府信赖、群众信任。

目前，“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已在新安街道、石岩街道、福永街道等多个街道全面铺开，全区600余名律师为124个社区法治建设献计献策。律师进驻社区以来，除了承办日常案件，还将法律知识传播到居民、企业、社区、政府等多个层面，引导居民通过合法途径表达利益诉求，帮助企业提高法律风险防控意识，协助社区干部提高基层法治治理水平，“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亮点频现。

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力促“一村（社区）法律顾问”在基层深根发芽。

管仲曾说：“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建立健全的工作制度能使“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的核心价值观要求进一步细化，落到实处。“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开展伊始，宝安区有关部门就制定了相关的工作制度，石岩街道更是出台了《“一社区一律师”实施方案》、《“一社区一律师”工作考核办法》，进一步明确律师参与“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细化社区法律顾问的遴选退出、经费保障等实施细则，形成了规范“一社区一律师”工作的长效机制。

明确社区法律顾问的遴选、退出机制。早在2005年左右，深圳律师就积极响应上级主管部门的号召，履行社会职责，开展了大量“律师进社区”工作。在推进“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的工作时，针对部分社区、居委会已有长期合作的驻点律师这一情况，宝安区有关街道对居委会、工业园区驻点律师、购买服务情况以及运作现状进行排查摸底。该区以“延续传统、自愿选择”为原则，结合“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工作的相关文件要求，对符合相关要求的社区沿用社区法律顾问，律师数量和服务时间不能满足基层需要的社区则公开遴选律师团队及常驻律师，并由各律师事务所分别与驻点社区签订《法律服务协议》。

为确保社区法律顾问的服务质量，敦促社区法律顾问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以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形势，宝安区还制定了社区法律顾问的退出机制：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每月对律师进行考评考核，对表现优秀的律师进行宣传推广，采取以案定补等形式给予适当奖励；对没有按工作职责要求完成工作任务的社区法律顾问，有关部门提出改进意见或视情况不再继续聘用。

开设专门办公区，实行全天候值班制。

各街道、社区为社区法律顾问提供专门的办公场所，配备齐全的办公设备，确保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的顺利开展。今年6月，石岩街道启动“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社区法律顾问进驻到22个社区居委会、股份合作公司和4个较大工业区党群服务工作室，石岩街道统一制作了社区法律服务工作室门牌标识、律师在社区提供法律服务工作台牌、工作登记簿。

此外，宝安的部分社区法律顾问服务时间由一周一天增加到一周五天，并为社区提供全天候法律服务，显著提高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延续性和时效性。如进驻福永街道13个社区的两名律师从周一至周五全天候为社区服务。同时，该街道执法队还向律师事务所购买法律服务，驻点律师每周一至周五进驻执法队现场办公，引导辖区居民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诉求，规范执法队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石岩街道的社区法律顾问也将工作时间改为周二至周六全天。其中，社区法律顾问3天在所辖居委会办公、1天深入工业园区办公、1天深入居民小组办公。社区法律顾问一周五个工作日全天候提供法律服务，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为社区基层管理提供法律支持、为社区企业宣讲法律风险防范知识，有效的化解了社会矛盾，加快了基层法治建设的进程。

建立健全多方联动机制。石岩街道《“一社区一律师”实施方案》明确定期组织驻点律师事务所、驻社区律师、各居委会和股份合作公司负责人召开“一社区一律师”工作交流会，通报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分享工作心得，听取律师和社区的意见建议，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具体的要求和措施。各街道设计统一台账登记册，社区顾问律师认



真对工作进行登记，对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或涉及居委会、集体经济、群众重大利益的事项，及时提出法律意见并向街道汇报。

创新社区法律顾问服务模式，实现法律服务线上线下全覆盖。

自“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开展以来，律师走进了新安街道“法律超市”，为辖区居民提供便利的法律服务。据悉，“法律超市”由驻社区律师和街道司法所专职人员定期提供法制宣传、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法律援助等20多项法律服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便利的法律服务。该街道还建立了“黄马甲”法治宣传队，为居民群众送上各种法律法规宣传资料“大礼包”，驻社区律师为居民热情解答了有关婚姻家庭财产分割、劳动合同纠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

自福永街道“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在街道13个社区全面开展以来，社会反响良好。为进一步推广此服务，“阳光福永”微信平台开通“一社区一律师”线上咨询功能，居民可以通过该平台以语音或文字的方式，进行法律咨询和预约法律服务。“阳光福永”服务平台会实时将居民信息及法律问题推送至对应社区驻点律师。社区驻点24小时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从而实现法律服务线上线下全覆盖，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

认真履行股份合作公司法律顾问职责，促进基层社区民主法制建设。

为股份合作公司换届选举保驾护航。从2011年开始，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州）、县（市、区、旗）和乡镇四级党委进行换届。股份合作公司领导班子换届活动也陆续展开。这是股份

合作公司和社区居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搞好新一轮换届工作，对于加强股份合作公司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公司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区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组织李慧律师等为新安、西乡街道近四十余个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并参与西乡街道辖区41家股份合作公司换届选举工作的全过程，协助各股份合作公司顺利完成全部换届选举工作。一是在换届选举初期准备阶段，律师结合股份合作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股份合作公司的选举办法，协助街道办汇编换届选举工作指导意见。二是在各股份合作公司开展选举工作后，顾问律师参与股份合作公司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协助制定选举材料、向各股东解答换届选举工作的法律咨询。三是为换届选举过程中出现的紧急情况、突发事件提供法律意见，在换届选举的股东大会上提供见证服务，保证换届选举工作的合法、公正、公开，维护换届选举工作的严肃性，让法治理念深入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深入股民的心中。

深入基层，协助村（居）委会依法管理内部公共事务。社区法律顾问深入基层，积极配合村（居）委会工作安排，开展普法宣传，向基层干部和群众普及法律常识；进驻社区调解矛盾纠纷，把群众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不断发酵酿成恶性事件，让群众享受到方便、快捷、便利的法律服务；同时增强群众法律意识，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引导群众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为村民出谋划策、解危纾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出谋划策，为股份公司章程修正提供法律服

务。2004年，深圳宝安、龙岗两区27万农民“洗脚上田”，原村的集体财产全部组建了股份合作公司，公司享有集体财产管理权。村里人变成城里人，原来的村民变成了居民、股份合作公司的股东，并根据责任田或户籍等因素持有股份合作公司的股份。原有的股份合作公司章程由于对股权转让的规定不清晰，没有明确股权继承人的条件和范围等弊端，已不能满足股民的要求，也制约了公司的发展。

社区法律顾问按照法律的规定为修改股份合作公司章程的程序提供了建议，并提供了完整的法律服务，使股民的股权转让更加方便、安全；进一步完善了股份合作公司的内部结构，使股份合作公司逐步走向正轨，提高了公司的竞争力，为股民日益富裕以及社会和谐做出了重大贡献。

宝安律师利用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执业经验，以“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深入开展为平台，为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积极投身法制宣传、参与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协助社区起草、审核、修订村规民约和其他管理规定，协助社区处理换届选举中的法律问题，为社区、股份公司、工业园区企业的重大项目谈判、签订重要经济合同和其他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

律师驻社区不仅有助于增强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促进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主决策和依法办事，让基层干部逐步养成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使群众能够自觉通过合法途径反映诉求，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合法权益，显著提升了社区的依法治理水平，有效推动了社区的基层法治建设。



围绕社区法律需求

创新法律服务模式



文 深圳市律师协会龙华新区工作委员会

深圳市律师协会龙华新区工作委员会成立时间较晚，辖区内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相对较少，但龙华新区工作委员会在落实“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上却毫不示弱。

龙华新区于2011年12月30日成立，辖区内有36个社区工作站和100个社区居民委员会，11家律师事务所。新区成立后，有4家律师事务所在龙华成立，7家律师事务所所属搬迁至此，为龙华新区提供法律服务，为新区法治建设提供动力。自“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开展以来，龙华新区所有社区都有律师签约入驻，真正实现“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全覆盖。这一举措，与新区管委会的高度重视和各司法所、社区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龙华新区管委会综合办不定期组织龙华区各司法所、深圳市律师协会龙华区工作委员会、社区代表及社区顾问律师座谈，听取各方意见，谈问题，讲成绩。虽然在“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中我们尚有不足之处，但新区律师紧跟社区法律需求、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得到了新区管委会的充分肯定。我们主要做了如下尝试。

打破传统单一的上门服务模式，将传统与现代互联网及预约服务紧密结合，力求为社区提供及时、无缝链接的法律服务。

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每个社区顾问律师每月至少要去一次社区固定值班，但实际上往往是律师值班时社区法律服务需求量或咨询量较低，而律师不在岗时需求量却明显增加。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固定值班外，龙华新区律师设计了预约登记制，引导咨询者通过QQ、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与社区法律服务平台对接，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一方面实现律师及时有效的提供法律服务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也能降低律师的时间成本。

及时总结经验，全面推广宣传。

龙华新区工作委员会了解到，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肖迎红律师团队在社区法律服务工作中紧跟社区法律服务需求，对症下药，取得了良好成效，便及时总结其经验，在新区范围内予以全面宣传推广。该律师事务所通过三大举措，切实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落到实处。

一是派出精兵强将，集结智慧、团体作战。

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担任了民治街道共七个社区的法律顾问，其充分认识到社区所涉及的法律事务非常繁杂，社区需要的是一名“全科医生”，单凭一个律师的力量远远不能满足社区各个方面的法律需求。对此，在选派驻村（社区）律师时，该所原则要求执业三年以上的律师方可担任，派驻民治街道七名担任社区法律顾问的律师中甚至有几名律师执业年限超过十年。他们与担任其他街道社区法律顾问的律师组成了一个工作团队，交流经验，分享好的做法，特别是在社区遇到疑难法律问题，利用集体的智慧，讨论出最完善的方案提供给社区。

二是结合社区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供法律服务。

为加强对各社区顾问律师的管理，充分掌握社区的法律需求，该所推选一名合伙人作为民治街道辖区社区顾问工作的“领头羊”，带领驻村（社区）律师走访了每一个社区。他们了解到，民治街道楼盘、商铺及“小产权房”众多、物业管理纠纷和租赁纠纷是民治街道各社区普遍存在且较为突出的纠纷，针对这一实际，驻村（社区）律师工作团队有针对性地编写了《如何做个好房东》、《如何做个好管家》等普法课件，面向出租屋业主、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进行宣讲，从源头上减少发生纠纷的隐患。

“城中村”私拉乱接网线是令人头疼的顽疾，驻村（社区）律师对社区的整治方案进行了审查，对方案中所涉及的各项合同进行了修改，并应邀出席了出租屋业主和管理者动员大会，就

安全生产、如何界定“黑网络、拉私网”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一一作出讲解。驻村（社区）律师的全面参予为“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顺利推进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三是创新工作方法，力求不流于形式，更具实效性。

除了预约值班外，该所积极探求法律宣讲新模式。2015年5月20日，该所将各社区的派驻律师联合一起，由民治司法所牵头在民治九方商场举办“民生法律大家谈”活动，针对目前比较突出的因房价暴涨而引发的二手房买卖业主毁约问题，通过律师与台下听众积极互动，以“大家谈”的形式将法律常识和法律思维普及到社区群众，打破传统“灌输式”的宣讲模式，受到社区群众的热烈反响。

依托社区法律服务平台，力争达到更深层次的法律服务。

我们在立足社区服务的同时，也敏锐地观察到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及辖区各类企业有着大量的法律服务需求有待开发并且也作了初步尝试，虽然主动开展相关法律服务仍有一些阻力，但我们仍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并将继续努力。

担任社区法律顾问是律师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窗口，我们希望紧跟市律协及龙华新区管委会的部署要求，借鉴各地好的做法，在互联网及律师专业团体及案例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继续努力，切实发挥驻村（社区）法律顾问的作用，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龙华新区的基层法治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法律顾问进社区”

的冷思考



文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刘泽华律师

受所属律师事务所指派，笔者有幸成为深圳市坪山新区的三个社区的法律顾问。自5月19日笔者首次进驻社区以来，已接连四次为其中两个社区提供现场法律顾问服务。从值班情况和笔者的工作经验来看，社区法律顾问有冷有热，有忙有闲，不一而足，由此引起了笔者对“法律顾问进社区”的一些反思，未必绝对正确，权当工作总结罢。

为什么需要社区法律顾问？

化解基层矛盾，培养法治意识，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是政府对社区法律顾问的基本要求。而社区呢？笔者认为，目前社区对驻点法律顾问的期待会因社区民情而有所差异：社区对法律顾问的希望很大程度上保留在基本的法律需求层面，特别是协助社区解决正在或者将要发生的纠纷；对居民来说，若非碰到迫在眉睫的争议，一般也不会特别去寻求律师的帮助，哪怕免费的法律顾问就在身边。这也真实地反映出目前社区的整体法治现状，一方面表现出经济发展并非特别发达，另一方面传统人缘与民间自治意识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当然，笔者进驻社区的时间尚短，对社区民情了解有限也是重要原因。

为什么需要社区法律顾问？身为律师，笔者认为，居民的权利维护与义务厘清需要社区法律顾问；社区的长治久安需要社区法律顾问；而国家的法治建设尤其需要从最基层的村社建设抓起，让全体公民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开始树立法律意识，从最常见的家长里短开始培育规则意识，推己及人，修身齐家，参政议政等，由小到大，见微知著，如此，则法治始能有坚实的民众基础。法治昌，则律师强。而现在，反之亦然，律师强，则法治昌盛才有望。

社区需要什么样的法律顾问？

前文已述，法律顾问进社区，最初接触需求的往往是社区正在发生的争议。细分起来，此类争议范围其实也相对较为有限，以笔者所服务的两个社区来看，原农村转为社区、村民转为居民过程中伴随的集体股份制问题，以及原集体土地国有化过程中的土地房产权属纠纷，这可能是目前深圳龙岗、坪山、大鹏等管辖社区最易引起警觉的争议，并且动辄牵连十数年二十年，属于典型的历史老大难问题。

除去股份与房地产问题，一般婚姻家庭纠纷则是普通老百姓最为常见的争议，包括离婚、财产分割、继承、赡养与抚养等，这其中与前述股份和房地产关联起来的婚姻家庭纠葛就更为复杂。此外，目前深圳各社区一般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工商企业，由此而来劳动争议也是社区较为常见的纠纷。至于其他纠纷，则要看各社区的实际情况，但相对而言，其他纠纷与前述三类纠纷相比，往往并不成规模，更为偶发和少见。

明白了社区的常见纠纷，也就不难理解法律顾问进社区初期被咨询最多的问题何以基本上都集中于上述三类，同样也就不难理解何以社区会对法律顾问期待更多的并非何等“高大上”，而是“接地气”的对口、务实、简捷、高效的法律服务。当然，“接地气”并非不要求专业，可能恰恰相反，由于社区居民居住相对集中、相应的争议问题较为常见和普遍的特点，法律顾问的法律服务要求更高，否则，处于这样低头不见抬头的紧密型生活圈中，一次不专业的解答，有可能严重误导众多类似问题的法律服务需求者，这势必对社区建设包括法律顾问今后的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社区法律顾问，需要具备解决常规、传统法律争议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尤其是能够解决社区相对突出的实际争议的法律专业技能。

但是，仅仅具备这种技能并不足够。社区顾问虽然扎根一线基层，其所面临的问题也往往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站在法治建设这样的高度，从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律师的效用出发，社区法律顾问应当还有更高的专业奉献精神，在解决社区实际需求前提下，将专业服务超前、强化和提升，让社区纠纷化解于法律与规则中，让基层矛盾消弭于公民法律自治中。这，或许是成熟的社区与成功的社区法律顾问所共同需要的和需要解决的。

目前社区法律顾问服务存在的问题

法律顾问走进社区，为社区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律师也乐于为基层法治建设贡献绵薄之力，但良愿的实现总有个过程，过程中难免会有些许的不尽人意。

首先是法律顾问的投入、适应与社区的认识、配合尚有待进一步磨合和提升。法律顾问和社区双方均认为法律顾问进社区是件好事儿，但如何真正实现社区法律顾问的价值，使双方互惠互利，还有待观察，也有待探索。法律顾问进社区没有固定的套路，一切要结合所在社区的实际情况来相应调整。笔者认为，这方面也亟待有关部门提炼和分享成熟的经验，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律师事务所、律师、社区与政府的多方良性互动。

其次是法律顾问工作模式问题，包括服务时间、场所、方式等。多数地方社区法律顾问要求每月至少现场值班一天或者一次，而坪山新区的法律顾问要求每周值班一天，时间要求上明显提高。社区究竟需要法律顾问提供多长时间的现场值班才更合适，笼统来看似乎是多多益善，但实际执行却未必如此。

刚进社区时，顾问律师会尽快与所接触到的社区工作站包括股份公司的工作人员交流，此过程中自然会有较多法律问题冒出来，但三四次接触（大概一个月）以后，能够“挖掘”到的法律问题就基本难有了，而社区居民对法律顾问的了解不足，短时间内还没有形成足够的信任，自然不愿意把一些并不紧迫的潜在法律纠纷提到顾问面前，此时法律顾问进社区就会面临“安静”期。而让一个有一定执业经验的律师每周固定一整天的时间去值班，估计相当多的律师都会

犯难，虽然律师们既已承诺自然会全力以赴；何况很多时候律师即使泡上一整天也未必能有一个人来咨询。这种发挥不了实际用处的时间消耗最让律师难受。因此，笔者建议，一是将值班时间稍作调整，根据律师进驻社区的前期、中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法律需求数量和难易程度，设置不同的值班要求；二是可以规定居民但凡提出服务要求，律师需一周之内予以解决，居民有何问题，可以先集中到社区联络员处，以便律师根据服务需求的量和紧急程度灵活安排进社区的时间，提高社区法律顾问的工作效能。

法律顾问怎样才能服务好社区？

无论是从基层管理的角度，还是社区基层建设的高度，社区都需要法律顾问，则是毋庸置疑的。但有需要并不一定就好服务。总结一个多月来的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笔者认为法律顾问要想服务好社区，大致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常见的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专业领域包括：婚姻家庭，房屋土地，股份股权，劳动保障，借款贷款，刑事责任等。当然即使只有这几个领域，也未必每个律师都能储备全部相关知识，但进驻社区的律师至少需要具备初步解答这方面法律咨询的能力，以便在咨询解答的第一时间提供准确的专业服务，如此方不至于让问者失望，甚者误导民众。

其次是要有主动服务的精神。社区，尤其是尚欠发达的社区，居民的法治意识有待提升，不少人仍习惯于有问题找熟人找政府，虽然习俗化解也是解决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既然法律顾问进了社区，法律顾问就有责任也有条件将更多的法治资讯普及到居民中，这种用法普法的工作更多的有赖于法律顾问的主动推进，包括主动向社区工作站、股份公司工作人员、社区居民等普法用法，所谓“地头田间、家长里短”的顾问模式，强调的即是主动服务精神。

再次是注重开展普法讲座。这种公开讲座在法律顾问进社区的全程中都非常重要，进驻初期的公开讲座有助于律师迅速取得居民的熟识和认可，进驻中后期开展的有针对性的公开讲座则有助于集中解答居民的疑难困惑，疏导其内心纠葛。

最后是要扩大知识储备量。这种知识储备既包括了解社区、熟识社区居民习惯，也包括掌握与社区建设相关的资讯，当然必要的是相关法律专业知识的及时更新。

创客空间的法律服务初探

文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俞菁华律师

作为一个创业者的开放式社区，创客空间自2010年进入中国以来，一直致力于共同开发有趣和富有意义的项目，举办包括电子、嵌入式系统、编程和机器人等不同主题研讨会和培训，提供运营代理、融资支持和销售平台等运营服务使得项目能够产品化走进日常生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北京创客空间、上海新车间、深圳柴火创客空间等为代表，政府、民间资本、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创办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不断涌现。

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支持服务机构为初创企业提供法律、知识产权、财务、咨询、检验检测认证和技术转移等服务”，可见，为创客空间提供财务、税务、管理咨询等以中介机构为核心的专业服务具有广阔空间。因为互联网创业企业的特质，创客空间的法律服务相对于常规的法律顾问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股权融资、知识产权等几个领域，笔者结合对部分互联网企业及相关项目的法律服务经验，对创客空间的法律服务进行如下梳理。

参与创客空间公司设立

在设立阶段，创业者可能仅仅有创意或产品，尤其很多创业者是理工科背景的技术型人才，在初始阶段毫无疑问更侧重于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往往缺乏个性化的公司章程设计和相关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法律服务在公司设立的初始阶段尤为重要。

创业项目的合法性论证及交易架构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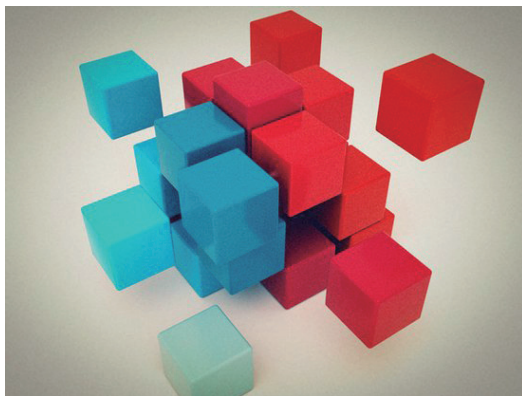
当下很多创业项目都与互联网金融、社交类app等有关，项目本身有可能会对现行生效法律法规有所突破，或者处于一些没有明确规定的

边缘地带。一方面，创业项目无论如何创新，最终都会体现为各方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创新项目落地的过程也是通过各类协议、章程等书面化的形式明确项目执行依据，并最终可以分解为各类法律关系并受其规制；另一方面，任何设计都无法排除法律风险以外的道德风险，不排除良莠不齐的市场环境中存在利用新技术、新模式进行经济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或者说，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违法犯罪形式，一些暴露出来的案例会对整个行业或新生事务产生不良影响。

所以，律师可以全面分析创业项目所涉及的相关法律关系并进行合法性论证，并根据其本质法律关系设计项目交易架构。例如各类社交app在上线时都涉及到注册用户规则，目前很多平台的规则都不同程度存在互相抄袭、约定笼统不明确、不能全面体现各方权利义务等问题，为此，平台应根据自身的特殊性制定更加适合平台特征的规则，为避免和解决争议提供更加明确的依据。

协助创业项目选择最有利的组织形式

创业项目可以选择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合伙、普通合伙甚至个体工商户等不



同的形式，各类形式的利弊、适合的行业或阶段等均不同。律师可以根据企业及创始人的具体诉求和利益关切点，结合项目实际，选择最合适的组织形式，而并一而概之地以格式公司章程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为创业者提供更多选择。

例如，有限责任公司是创业公司最为普遍、数量最多的组织形式，但是受到股东人数限制等约束，对于拟上市的创业项目来说，在上市前需要将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增加了上市成本。对于股东人数众多、资合性更强的股东众筹类项目而言，选择股份有限公司更具优势，由领投人发起设立、跟投人认筹募资完成设立。对于创始人之间根据信任和人合性特征的项目，选择有限合伙企业形式一方面可以授权执行合伙人更大的自主权和利润回报空间，同时，对于部分资金投资为主的有限合伙人可以实现风险隔离。

充分分析政府的扶持政策

制度是存在竞争的，尤其是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差异恰恰是地区竞争的重要内容，律师对于创业项目选择在何地注册同样应对各地不同的产业扶持及税收等政策形成分析意见可供参考，仅以深圳来说，各区对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就有很大不同，比如目前各区中福田区对公司注册地为福田的初创期和中小型企业政策比较优惠，南山区对大中型企业的政策比较优惠。

合理安排公司股权与控制权

创始人之间的股权安排往往是今后容易产生争议的地方，在公司设立之初对股权没有进行合理安排容易导致公司僵局、利益分配纠纷、亏损承担纠纷等各类问题。公司的控制权和利润分配权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做出个性化设计，以充分保障股东的意思自治和最大程度便利公司高效决策、利益平衡。所以，在设立阶段，创始人根据各自的投资、分工等不同合理确定各自的持股比例十分重要，这对后期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或不同阶段的股权融资安排都会有重要影响。

为股权融资与股权众筹提供服务

创客空间的股权融资对创业者来说几乎是天天面临的问题，如何融资、在哪一阶段融资、如何估值、出让多少股权、如何吸引投资人或者如何挑选合适的投资人等等。律师无论是代表资金方还是目标公司或创始人团队，在项目尽职调

查、交易结构设计、谈判及协议文本签署等各个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资本是自由的敌人，创业项目需要资金方，同时，对于创客空间的股权融资来说，与传统的天使投资、VC、PE、pre-a轮、以致到新三板、创业板、IPO等阶段，股权众筹或许更符合其互联网精神。

创客空间的股权融资通过股权众筹的方式实现同样离不开律师提供的专业法律服务，对于平台来说，可以委托律师草拟、审核、修改、完善平台的众多注册及交易规则、交易相关的《投资协议》、《有限合伙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等法律文书；此外，项目的真实性对项目融资成败至关重要，对于部分项目推介过程中，委托专业律师对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并出具《尽职调查报告》，对项目相关的主体、资产、资质等进行专业的调查，协助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和平台有效筛选项目，避免虚假项目；鉴于股权众筹人数众多，且网络交易的特殊性，在签署相关授权文件或协议时，可以委托律师见证，对签约主体、签约的文本、时间等进行合法有效的见证；最后，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因投资者退出、平台挪用资金、融资方利用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身份侵犯投资者利益等各方面纠纷的，律师参与相关的谈判或诉讼事宜，提供解决方案。

有效规避劳动法律风险

创客空间的很多项目或企业都处于初始阶段，没有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可能是动力不足或控制成本，但是，怀着共同梦想和创业激情的团队文化在执行层面显然更优于传统的劳资关系。对于创客空间的企业来说，遵守《劳动合同法》等相关规定，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劳动者缴纳社保等基本资方义务以外，更重要的法律服务是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竞业限制等内容。

竞业限制与商业秘密保护

竞业限制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方面，对于创业公司吸引的技术人才或核心团队人员，在加入公司之前与原用人单位可能是存在相关竞业限制条款限制的，如何没有进行梳理和风险排除，公司及该员工均可能被前用人单位起诉；另一方面，公司对己方员工同样需要进行竞业限制约束，通过工资结构调整、约定竞业限制条款等方式管理团队，这是互联网创业项目的特殊性决定的。

在互联网时代，创客企业一方面要做好内部管理，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明确不同层级的员工的保密责任与义务，从各个不同的岗位设置，到保密责任的大小进行具体明确的规定，建立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另一方面，要防范竞争对手获取本公司的商业秘密：完善企业技术保护与防范措施，包括防火墙技术、数据加密技术、数字签名技术和数字认证技术等。

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简单来说就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将公司的股权通过多种方式分发给公司骨干，实现利益一致留住核心人才。股权激励的财务价值在于公司上市实现股权价值最大化，公司不能上市的，对激励对象而言主要的回报就是现金分红。股权激励的对象根据人力资本价值、历史贡献、难以取代程度等集中于公司核心层、部门经理以上经营层和特殊人力资本持有者。总体而言，从股权激励工具上看，主要包括权益结算工具和财务结算工具，权益结算工具包括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业绩股票、员工持股计划等，其优点是激励对象获得了真实的股票，大股东或公司获得现金收入，缺点是股本结构变动，大股东股权稀释；财务结算工具包括股票增值权、虚拟股票、利润分红等，其优点是保证了大股东的控制权，原股权结构不变，确定是激励对象无法获得真实股权，激励作用有限。

股权激励的实施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企业目的、激励对象的利益关切、具体对象的差异化平衡、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等，需要进行差异化阶段化设计。创客空间的互联网创业项目在前期发展过程中，经常面临资金激励不足、开发周期及市场风险、项目前景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创始人为了吸引核心技术团队共同创业应考虑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激励对象、股权比例、激励对价、激励周期、激励方式、退出机制等进行全面约定，采用期权池模式的还应考虑到股权激励计划对后期吸引战略投资者的影响。

筑造知识产权坚实壁垒

三流企业卖苦力、二流企业卖商品、一流企业卖专利，尤其对于创客空间企业，依靠知识产权获取利润对企业最终占领市场制高点至关重要，当下，知识产权的数量、质量、经营管理水平已经成为判断一个高科技公司优劣的重要指

标，制定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方案将会为企业成功上市起到关键性作用。明确以转让、许可使用、入股等方式对公司专利、商标、技术秘密乃至企业名称等进行全面的权属及法律状态审查，在权属清晰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的经营模式、利益各方法律地位、公司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等进行全面的规划。

公司应当具有与主营业务、特殊行业相对应的注册商标，文化产业企业的著作权，农业企业的植物新品种权等，尤其，发明专利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企业技术水平以及相应的企业所能控制的市场空间，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发明专利的科技型企业能成长为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次，在拥有相关知识产权的基础上，企业必须有清晰的盈利模式，知识产权权属证书不是花瓶，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必须具备知识产权产业化的明确路径。而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也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所以创客空间公司还应当具备相当量的知识产权申请。通过适合自己的创新机制或借助外脑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新产品或新技术，然后拿来申请专利保护，或者受让或许可获得专利或专利技术都是进一步拓展企业知识产权数量的有效途径。最后是公司的知识产权经营管理水平，公司内部有一个健全的管理制度和队伍，以专业技术人才、知识产权律师等人才为基础的团队，在境外申请与保护、技术人员激励与监督等核心问题上有所建树。

知识产权是“关涉未来”的，涉及到公司的发展前景，知识产权纠纷攸关企业是否成功上市。创客空间企业需对知识产权慎重对待从企业管理和内部机制完善的战略高度提高认识水平，在专家顾问的指导下及早制定、实施知识产权规划。为企业未来上市做好准备。

结语

这是鼓励创新、支持创业的时代，深圳是设计之都、创新之城，创客空间在深圳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也为深圳律师的业务发展提供的新机遇。创客空间集聚了大量互联网创新、发明专利等创业项目，这类初始阶段创业企业尤其需要公司设立、股权融资、劳动关系与股权激励、知识产权等较为突出的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可以紧密合作在创客空间建立起法律与财务、税务、管理咨询等综合性专业服务能力，为创业者服务，与创业者共同成长。

爆米花经济



关于影院禁带外来食品的法律分析

文 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赵波律师

今年的暑期已经来临，各大影院也成了市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精明的电影人更是不肯放过这个一年一度的观影高峰期，摩拳擦掌地选择在这个时候上映自己的新电影。不过在观影的过程中，很多观众却遭遇了不愉快的经历——进场时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理由是不能携带外来食品。

7月20日，《现代快报》报道，近日，家住南京市江宁区的徐女士在网上发帖称她去影城看电影时，因为携带了汉堡和薯条而被工作人员告知外带食品禁止入内。《现代快报》的记者在得知徐女士的遭遇后，走访了南京的7家电影院，其中5家影院都在检票入口处设置了“谢绝外带食物”的提示牌。

其实类似的报道早已屡见不鲜，对于影院禁止自带酒水的规定一直被观众所诟病。很多法律专业人士也认为，类似规定属于强加给消费者的“霸王条款”，甚至就连某省市的工商行政部门都表示，该行为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应该予以制止。

据国内某影城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该院线包括爆米花在内的商品销售收入约6.31亿元，毛利率高达68.85%；票房收入虽然高达41.05亿元，但毛利率仅19.58%。其业务里最赚钱的居然是爆米花，占了卖品利润的72%，这也就是影院独特的“爆米花经济”。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到底该如何看待影院禁止自带食品的相关规定呢？笔者认为对于该问题，切不可简单化，更不能一刀切。

从《合同法》角度看影院禁带外来食品

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法律专业人士，在提到影院禁带外来食品的时候，均提到了这样一个理

由，即认为类似规定属于“霸王条款”。那么何为“霸王条款”，该类规定是否属于“霸王条款”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是“霸王条款”。所谓“霸王条款”，一般是指一些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告示或者行业惯例等，限制消费者权利，严重侵害合同相对方利益的条款。而之所以导致霸王条款的存在，往往是因为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实力相差悬殊等原因所致。

很多观众认为，观众自带食品不许进入影院，而影院自己销售的食物却可以带入，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对此，笔者认为，所谓的“霸王条款”表现在合同法上实际上就是一种格式合同，影院禁止外带食品的规定是否合法，需要结合我国《合同法》的具体规定来考量。《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若确如很多观众所反映的情况，影院很显然违反了《合同法》第四十条的相关规定，属于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况。在此意义上将影院的规定认定为“霸王条款”，从合同法角度来看没有明显争议。

但是大部分影院还是认为消费者完全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如果不能接受影院规定可以不来观影。最能支持影院做法的原因还在于，在他们认为禁止外带食品是为了给观众提供优雅的观影环境。若影院从维护观影环境出发，只提供爆米花和水这两样食品，并尽到告知义务“外带食品谢绝进入”，消费者知晓相关规定并自愿购买电影票；或者消费者已多次在这家影院观影早已知晓



影院的规定，可以认定影院与消费者之间事前就达成了某种协议，即消费者在购票之时便已默认了影院的规定，那么，便不属于《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基本可排除影院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嫌疑。此时影院的规定便不能简单的认为是一种“霸王条款”。

论述到此，相信还有观众认为，若影院只准携带影院内部提供的爆米花和水，而观众携带的则不准带进去，又该如何认定呢？对此，笔者认为，在可携带食物相同的情况下，影院的这种规定很可能另有目的，而非单纯从维护观影环境出发，此时仍有违反《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嫌疑。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角度看影院 禁带外来食品

作为一部最具契约精神的法律，我国的《合同法》虽有第四十条规定的例外情况，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崇尚缔约自由、鼓励市场交易、保护合法债权、化解合同风险，只要缔约双方在事前对自己的权利义务是已知的，缔约时人身是自由的，不存在一方胁迫、欺诈、隐瞒另一方的情况，那么便应尽可能的尊重双方所签订的协议，

不能轻易将其推翻。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影院禁带外来食品的规定，都看做是一种“霸王条款”予以轻易否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文作者赞同影院的做法，而是说如果要否定它就一定要在现行法律上找到合理的依据，除了要合乎法理之外，最好能做到于法有据。这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一部专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特别法，在维护消费者合法利益的力度上比《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又大了很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对比《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新消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明确了合同双方的主体，即一方为消费者，另一方为经营者；指出了“霸王条款”的存在方式，即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然而，对于最为关键的问题，即何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怎样才算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相关法律未做进一步的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与上一部分我们对于《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分析相似，在影院提出其之所以禁止观影者携带外来食品进入影院，完全是从维护观影环境出发，并非为了一己之私的时候，其规定的公平性、合理性便存在很大的争议，从而对其是否属于“霸王条款”的判断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

2011年12月份，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上诉人凌斌与被上诉人南宁市百老汇影院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便认为“百老汇影院谢绝观众外带食品进入影厅，是为了保证向观众提供良好的观影环境是履行经营管理者管理、维持影院经营秩序的行为。该规定并不存在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或者减轻免除百老汇影院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情形。”并据此排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和《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适用。

“故百老汇影院谢绝观众外带食品进入影厅的规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凌斌据此主张该规定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基于上述理由，该院最终判决凌斌败诉。在此我们不欲对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做任何评述，只

想说明正是由于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该问题规定的比较模糊，而相关司法解释也未涉及该问题，由此才导致了消费者的最终败诉。

对比影院禁带外来食品，餐饮行业的“禁止自带酒水”被认定为霸王条款目前则有法可依。2014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其中第十六条规定：“食品、药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消费者依法请求认定该内容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随后中国消费者报在采访最高院时，问及该规定是否适用于餐饮业制定的不平等格式条款时，最高人民法院于2月12日回复时表示，餐饮业制定的不平等格式条款(俗称“霸王条款”)虽不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但对于违反《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条款，消费者可请求人民法院确认“霸王条款”无效。由此明确了餐饮行业“禁止自带酒水”之类的规定属于“霸王条款”。据此，是否可以推导出影院禁止携带外来食品也属于“霸王条款”在法律界则具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一定的争议。结合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笔者还是坚持认为，对于该问题，应分情况予以区别对待，不宜简单说它是否属于霸王条款。

关于影院禁带外来食品的立法建议

虽然从现行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笔者不建议一刀切地将影院禁带外来食品的规定都认定为一种“霸王条款”，但是在倡导人性自由、消费保护的当下，影院的这种做法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特别是那种以维护影院环境为由、不许观众自带、却在影院内部大肆经营各种食品的行为，不但是一种典型的“霸王条款”，而且还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让观众嗤之以鼻。然而，这些本应成为历史的“霸王条款”，何以仍然横行无忌？细究起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如上所述，法律未能进行明确的界定，尤其是司法解释没有完全涉及。如同餐饮行业“禁带酒水”一样，成为行业潜规则已然多年，虽然后来在媒体的采访过程中，最高院对餐饮业“禁带酒水”的行为作了相应说明，然而对于影院禁带外来食品的潜规则至今未做任何说明；另一方

面，无论是行政处罚，还是民事赔偿都存在极大的缺陷，没有常态化的监管措施和有效的维权通道，导致维权的成本过高而让消费者大多选择放弃。正是基于此，以影院为代表的企业一方才有恃无恐，明知自己的行为违法也毫不在乎。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即便出台了某个领域的司法解释，却因为内容没有更广泛的涵盖和参照原则，使得电影院禁带食品之类的行为，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公众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还缺乏关键的支撑手段。

如何让“霸王条款”不再“霸王”，并让消费者权利得到尊重与保护，仅仅依靠商业道德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提高消费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固然重要，然而增加违法行为的成本，以此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果，更应是法治建设的题中之义。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要彻底解决影院禁带外来食品的问题，必须还得在立法上下功夫。

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或者出台《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配套的司法解释，将笼统模糊、无所不包又毫无所包的法律条文，变为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的法律规范。尽可能排除法律法规的争议性，让何为“霸王条款”的规定更加明确化、清晰化，彻底杜绝影院打擦边球的情况。

针对影院的“霸王条款”，在立法上增加惩罚性的赔偿。目前在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上都明显偏软，消费者遭遇“禁带食品入内”的霸王条款后，要么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寻求支援，虽然在协调下可能让对方让步，然而一番折腾也会让人心力憔悴。若是没有更为明确而带惩罚性的赔偿，并辅以刚性的惩戒措施，那么写在墙上的“谢绝外带食品”告示牌，就会成为管理缺位的真实讽喻。

明确常态化的监管措施和有效的维权通道。针对影院的“霸王条款”，目前无论是行政处罚，民事赔偿都存在极大的缺陷，没有常态化的监管措施和有效的维权通道，导致维权的成本过高而让消费者大多选择放弃。正是基于此，以影院为代表的企业一方才有恃无恐，明知自己的行为违法也毫不在乎。

综上，对于影院禁带外来食品不能一概而论，而应结合相关案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由于现行法律尚不健全，对影院等消费场所的法律监管仍有所欠缺，因此，下一步必须加强立法，从制度层面对影院的经营行为进行约束，让影院的霸王条款不再存在。



房地产纠纷案件

同案异判之原因与规制



文 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 颜宇丹律师

“同案异判”也称“同案不同判”，是指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同法院之间、同一法院不同庭室之间乃至不同法官之间，对一些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在这众声喧哗的时代，“同案异判”似乎成了备受社会舆论和普罗大众所诟病的司法问题。在房地产纠纷案件中，同案异判现象屡见不鲜，对司法公信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同样，司法诉讼中也不存在案情完全相同的案件，任何一个案件作为一定时间地点中的事件都是唯一的和不可重复的。业界时下流行的看法是，在案例指导制度中，“同案”是将一个待决案件的案件事实与一个先决案件或案例的案件事实做对比的结果。由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相同的两个事物，司法裁判中也不存在案件事实绝对相同的两个案件。因此，“同案”的确切表述应当是“同类案件”或“类似案件”，而非“同样案件”或“相同案件”。所谓“同判”，是指“同样的判决”，具体到指导性案例的意义或价值来说就是：如果一个待决案件的案件事实与一个指导性案例的案件事实被认为是相同或同样，

那么就应该采取与指导性案例相同的判决。

就“异判”的内涵而言，是指同类案件作出了不同的判决。“同案异判”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种情况：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对同类案件的生效判决不同（其中包括同一审判庭法官同案异判和不同审判庭法官同案异判）；同一审级不同法院的法官对同类案件的生效判决不同；不同审级法院间的法官对同类案件的生效判决不同。“人们不能在这一诉讼人之间以这种方式决定案件，而在另一个类似案件的另一对诉讼人之间又以相反的方式做出决定。”同案同判的基本要求是“相同情况相同对待，类似情况类似对待。”

“同案异判”的具体案例

【案例一】深圳市法院在审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中，对《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2010版)》第六条“叁、按揭方式付款”中规定：“签订本合同之日起X日内办理银行贷款并向出卖人支付剩余价款”的理解认识上容易产生歧义和纠纷。出卖人往往主张买受人应当在此约定的期限内办妥银行按揭

贷款，并将所贷款项实际发放到双方指定的账户内；而买受人则往往主张此约定期限仅指向相关银行提供办理按揭贷款手续的期限，并非一定能够或在此期限内贷到款并发放到出卖人指定账户内。2008年7月31日，原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网络互动交流平台回复了相关业主对此条争议的提问时回复认为：“第六条约定的‘其余价款自签订本合同之日起×日内向银行贷款支付’是指‘在×日内向银行办理贷款支付手续’，具体的期限由交易双方自行协商。”故此，建议此处需要进一步明确所指日期是提交办理按揭贷款证件资料的期限，还是包括提交贷款证件资料、相关按揭贷款银行审核决定是否准予提供按揭贷款，以及所贷款项是否需实际发放到出卖人指定账户等的期限。

“同案异判”的案例：在一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中，房产买卖合同中约定买方采取按揭方式付款，于签订本合同之日起1日内首期支付本房产总价款的20%，其余价款自签订本合同之日起7日内向银行贷款支付。买方在合同签订当日已在银行提供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上签字，但银行实际未在房产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将买方所贷款项发放给卖方，在此情况下买方是否构成违约，深圳中院审理认为，按揭贷款银行是作为开发商的卖方所联系并指定，其发放的置业计划书中也明确指出购房者申请贷款的资格最终由经办银行审核确定，故买卖双方显然均清楚买方办理贷款申请手续后还需要经过按揭贷款银行的审核，亦明知银行何时审核通过贷款申请、何时发放贷款均不属买方所能预见或控制的事项。因此，按照常理推断，同时基于合同法规定的公平原则，应认为双方签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要求

买方在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完成按揭借款申请手续，而非要求买方承诺银行贷款在7日内发放给卖方。买方在与卖方签订买卖合同的当日就已办妥贷款申请手续，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买方存在导致银行审批或发放贷款迟延的过错行为，故卖方主张买方逾期付款构成违约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而在另一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中，房产买卖合同中约定买方应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日内首期支付涉案房产总价款的20%，其余房款自签订本合同之日起1日内向银行贷款支付。深圳中院审理认为，涉案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买方在签约时已选择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支付购房款，现又以约定在1日内办理完毕银行按揭支付购房款显失公平为由提出免责抗辩，有悖诚信原则，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二】在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一审认为，买卖合同的主体是原告与被告曾某，被告张某非合同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曾某向原告退还房款。上诉审法院则认为，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直接判决由两被告共同退还。本案改判的原因是一审认为在平常的商事合同活动中，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由合同当事人承担责任，不能直接要求非合同当事人的夫妻另一方承担责任。上诉审则击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认为在合同纠纷中应直接审查该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属夫妻共同债务的，债权人可在合同纠纷中直接要求离婚后夫妻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例三】因对支付房屋租金或房屋占有使用费截止时间上存在不同认识而改判。

上诉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请求将房屋占有使用费计算至原审被告实际搬离日，鉴于“实际搬离日”为超出本判决认定的事实之期限，处于尚

不确定的状态，故此，将原审判决“支付至实际搬离日止”改判为支付至“本判决确定的腾退之日（注：指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止”。但同一上诉法院却存在“同案异判”问题，在另一生效判决主文的第三项表述为：“……陈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叶某支付非法占用房屋赔偿金，从2010年4月16日起按每月400元计算至陈某实际搬离日止。”在上述被改判案件中原审承办人正是参照该终审判决的表述方式，即占用费计算至“实际搬离日止”，却被同一合议庭就此表述方式予以改判。

从某种意义上讲，且不论中院是否存在“同案异判”的情况，单就涉案情形而论，原审判决支付非法占用房屋的赔偿金（或占有使用费）至“实际搬离日止”，更符合实际，也利于敦促当事人自动履行，上诉审判决“至本判决确定的腾退之日止”的占有使用费，不利于当事人自动履行判决所确定的腾退房屋之义务，且实务中不排除存在判决生产前就腾退或判决确定的腾退期满后仍拒绝腾退的情形，这两种情形之下中院判决的执行都不无问题。

“同案异判”的成因

制定法本身较强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同案异判”。一是受语言表达能力的限制，弹性语言表达法规法条容易引起歧义，这一弊端在法律实践中无法回避，司法裁量不得不借助于法官对这种不确定和模糊之处进行解释；二是制定法的抽象性导致原则条款大量适用，法官在运用法律规则审判时，不可避免的要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和推理，当法官以法律原则为理解法律和进行法律推理的基点时，不同的法院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和推理，而不同的法官也会因为知识、性格、经验的不同对同样的案件作出不同的理解和推理而导致不同的

判决；三是制定法本身的迟钝和滞后性，正如梅因所说：“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的走在法律的前面”。这使得法院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一方面，法院不能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而拒绝审判；另一方面，如果受理却又确实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在此情况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无可避免。

司法裁量权上的地方化、区域化程度不同地造成“同案异判”。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或者法律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具有审判监督指导职能的省地市级人民法院针对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某一类突出问题往往出台“规范性”或“标准化”办案指导意见，以指导本地司法审判工作，力求“同案同判”。但这些指导意见又常常具有滞后性，且不同区域法院之间的指导意见又存在不一致，进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同案异判”。

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也是造成“同案异判”的原因之一。由于我国法律同位法之间存在“不一致”和异位法之间存在“相抵触”，再加上诸多地方立法标准存在差异，不同法律规范之间难免存在冲突。法官选择适用的法律法规不同，或者法官审判思路不同，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不同法官对法律的理解认知水平和适用不统一，对定案证据审查采信的标准不统一，导致“同案异判”。

为准确适用法律，切实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特定情形下出现的“同案异判”，更符合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正如有法官所言：“限制同案不同判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实际上却是以牺牲部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牺牲法律的公平换取法院判决的公信力……某些情形下的‘同案不同判’正是法律特性和程序正义的体现。”

“同案异判”现象的规制

美国著名法官、法学理论家本杰明·卡多佐曾经指出：“如果有一组案件所涉及的要点相同，那么各方当事人就会期望有同样的决定。如果依据相互对立的原则交替决定这些案件，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大的不公。如果在昨天的一个案件中，判决不利于作为被告的我，那么如果今天我是原告，我就会期待对本案的判决相同。如果不同，我的胸中就会升起一种愤怒和不公的感觉。”“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是古老的法律格言，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同案同判”既是自然正义的要求，也是宪法法制统一原则的要求。“同案异判”容易导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基动摇、让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蒙羞、极大伤害社会大众的感情，使民意受挫，严重影响司法的公信力，破坏社会法制建设。笔者不揣浅陋，就如何规制“同案异判”问题，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转变“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切实提升立法技术的同时，对已有制定法模糊、笼统的原则性条款，立法机关应根据社会需要适时修正、完善，增强条款的可操作性。法律解释机关对法律适用中的漏洞应及时予以填补或对既有法律条款作出与时俱进的细则性解释，使司法者真正有“法”可依，压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源头上统一立法。

司法机关应当切实提高法官法学理论素养和司法实践能力，以期法官能够准确适用和解释法律，变自由裁量为科学裁量，达到统一司法。

建立法律适用协调机制，统一裁判标准。法官的主观认知和个体差异以及不同地域的实际情况，都会对司法的结果产生影响。法律适用协调机制的缺失，容易造成不同区域法院之间、不同审级法院之间甚至同一法院不同合议庭之间各行其是的情况，这是产生“同案异

判”的主要原因之一。

进一步构建案例指导制度。雷德林克指出：“每个先例对未来的同类或类似性质的案件都具有某种指导力量。”案例指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定法规范的不足，避免“同案异判”。要统一法律适用，规范自由裁量权和量刑幅度，把握推进裁判文书上网的有利契机，进一步发挥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确保类似案件的法律适用基本统一，努力消除“同案不同判”现象。

近年来，社会各界吁请规范裁判标准、力避“同案异判”的呼声居高不下。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泱泱大国出现“同案异判”的现象并不惊奇，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恰恰确保了实质公平。然而，如果任由“同案异判”发展下去，必然会动摇到我国司法大厦的根基。我们还应看到，无论区分是否“同案”，还是完善立法、创立法律观点协调沟通机制和案例指导制度，都需要以法官基本的业务素质 and 职业道德作为载体和保障。如果法官不能高度树立同案同判的思想意识、不能运用法律思维方法准确地认定法律事实、不能秉承公正平等的司法良知和道德底线依法裁判，那么再完美的制度也是空中楼阁，注定无法发挥实效。

应当说，“同案异判”，未必就属于“错案”，毕竟完全相同的案件是不存在的。而法律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也要求正确适用它还需要有妥当的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上的不断探索，正如被大陆学者誉为“代表华人世界对法律的最高理解”的台湾学者王泽鉴所讲到的：“立法总是很短的，但是法律的适用将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德国民法的一百年，法国民法的二百年，所以真正法律发展的重点应该在法律的解释适用上。”



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对离婚诉讼的影响

文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吴杰臻律师

2015年2月4日，千呼万唤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终于面世了。作为一部我国有史以来最长篇的司法解释，对1992年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作出了大量的修正和补充。笔者作为一名长期办理婚姻案件的律师，尤其关注与离婚诉讼密切相关的条文修改，发现其中有不少修订对离婚诉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离婚案件管辖的影响】

对于当事人迁出户籍后尚未落户的处理更为简便。原司法解释将当事人迁出户籍后尚未落户的案件分三种情形处理：有经常居住地的、没有经常居住地且户籍迁出不足一年、没有经常居住地且户籍迁出超过一年。如今，新司法解释只区分有经常居住地和没有经常居住地两种情形。即，凡是没有经常居住地的，一律由原户籍所在地法院管辖。

堵住了原司法解释关于夫妻双方均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的管辖权规定的漏洞。原司法解释第12条规定：“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该条由于没有明确由原告起诉时被告居住地还是原告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导致相当多法院在立案时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一直被司法界所诟病。如今，最高人民法院终于意识到该问题，明确在这种



情形下由被告居住地的法院管辖。

明确军人离婚案的管辖。取消了原司法解释中关于军人之间和非军人对军人提起离婚诉讼的管辖规定。根据新司法解释，只有军人之间的离婚案件归军事法院管辖，其它的军婚案件（无论是军人对非军人提起离婚，还是非军人对军人提起离婚）均按照管辖权的一般规定来确定。

增加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的管辖规定。首先，增加了双方当事人均在国外定居的离婚后财产纠纷管辖规定。根据该规定，该类案件由主要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而不是由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最后居住地法院管辖。其次，明确规定允许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财产纠纷的管辖。

【对电子证据的影响】

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终于将电子邮件、

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电子数据列入证据范畴。实际上，在该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上述电子数据也一直在离婚诉讼中使用，但实际效果不如人意。究其原因，并不是法律没有明确将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等电子数据纳入证据范畴，而是法律没有明确该类证据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效的。

然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用了整整一节篇幅对电子证据的审查和认定作出规定，给予侦查人员收集证据和审判人员审查证据十分明确的指引。相比之下，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却只有这么一条规定，实在说不过去。司法解释如此简陋，导致的结果就是律师五花八门的取证和法官没有任何限制自由心证的司法乱象。对于此条规定，希望日后最高人民法院能吸取刑事诉讼方面的经验，对电子证据的审查和认定作出详细的规定。

【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影响】

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增加了一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此前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则相比，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

首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强调“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也就是说，司法解释对侵害他人权益方式取得的证据更为宽容了。这对于办理离婚案件来说，应该是有利的。至少，以偷拍偷录方式取得婚外情的证据不是那么轻易被否定。

其次，司法解释还规定“严重违反公序良俗方式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此时，笔者联想到火爆荧屏的电视剧《离婚律师》中色诱取证的情节。该情节曾经一度引起律师界的抨击，认为色诱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现在

看来，色诱取证是不是属于严重违反公序良俗，有待进一步考证。

总的来说，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没有新的突破，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稍作调整，没有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细致和明确，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而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却缺少了一定的参照标准。

【对涉及家暴案件的影响】

新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院保全的范围，即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责令其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这给予了涉及家庭暴力离婚案的当事人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法律依据。笔者原期望司法解释会对此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但目前看来，或许只能等待《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

尽管如此，在一些司法开明的法院，也开始逐步接受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申请，对侵害人作出相应的禁止令，使得受害者在诉前有更好的保障。

【对二审和再审的影响】

新民事诉讼法对与离婚案二审和再审影响主要有两点：

第一，一审判决不准予离婚，在二审中如果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离婚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与子女抚养、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在该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一审判决不准予离婚的案件，在二审中几乎都得到维持。这除了法院内部考核问题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因素就是，如果二审法院判决离婚的话，必然要对财产

分割进行处理。如此一来，当事人的财产问题等于一审终审，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如今，新司法解释对该问题作出灵活的规定，二审法院可以先调解，调解不成可以发回重审，甚至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经行作出离婚判决，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一审判不离二审维持”的怪象。

第二，离婚案件的再审只对原审判决中已分割的财产进行审理，对于原审法院没有判决分割或没有涉及的财产，再审法院一概不处理，当事人只能另案起诉处理。

【对虚假债务救济的影响】

在一些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为了达到侵吞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制造大量虚假债务。当事人为了让虚假债务在离婚诉讼中得到法院的确认，事先让虚假债权人只起诉他一人，没有起诉配偶。于是，配偶只有在离婚诉讼和执行程序中才发现存在大量确认债务的调解书或判决书。无论其在离婚诉讼中，还是在执行程序中提出异议，对于这种“生米煮成熟饭”的司法文书均非常被动。此次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确立了较完善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给予离婚案中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另案针对虚假债务的调解书、判决书申请撤销。

笔者认为，较之旧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修改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对离婚诉讼案件的具体操作方面是有一定积极影响的，得到了较多办理婚姻家庭业务律师的认可。笔者期望，在涉及家庭暴力离婚案的当事人申请人身保护令、非法证据排除、电子证据审查与认定等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会参考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出台更为详尽、具有实操指引意义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物流企业投保类别之利弊

文 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张勇律师

基本案情

某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与投保人A物流公司签订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单，约定保险公司以A物流公司的货主为被保险人提供运输保险服务。货主张某委托A物流公司运输一批价值人民币20万元的数码相机，A物流公司将该批货物委托B航空公司运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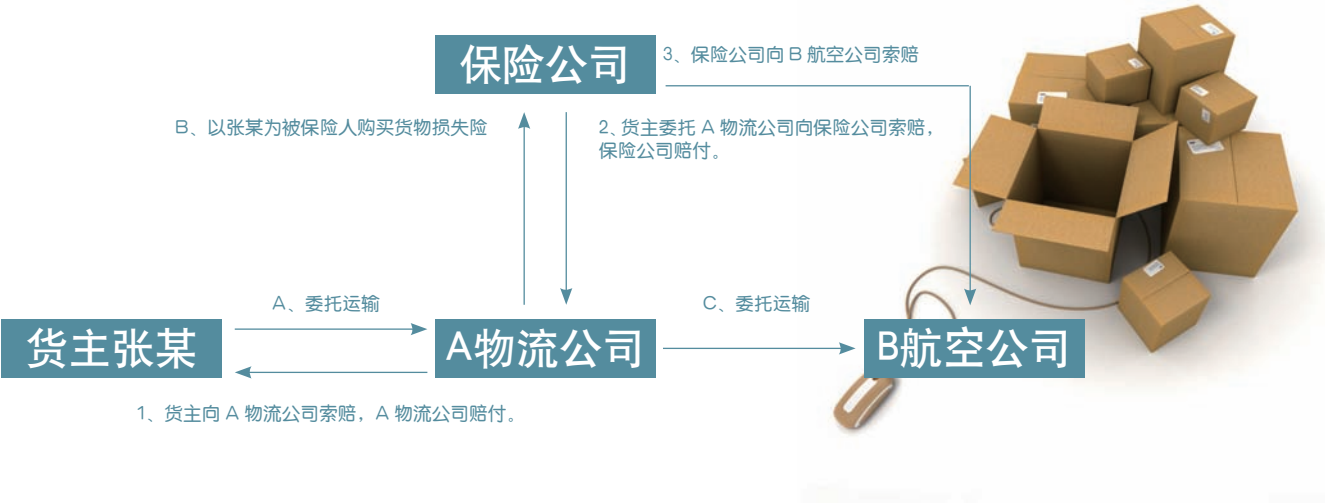
在运输过程中一箱货物被盗丢失，经张某核损，该箱货物价值人民币10万元，张某要求A物流公司赔偿10万元，A物流公司赔偿了10万元。随后，张某又委托A物流公司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与A物流公司协商后赔付9万元。现保险公司以取得代位求偿权为由起诉B航空公司，要求B航空公司承担因运输造成货物丢失的赔偿责任。

案情评析

本案是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前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取得损害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本案中，保险公司是否能向B航空公司主张权利，有两个前提：一、货主张某有向B航空公司索赔的权利；二、保险公司向张某支付保险金

附：案件关系图



的行为是合理的。

本案涉及险种是货物损失险，被保险人是张某，保险公司只能代位张某求偿，换句话说张某能向谁索赔，保险公司就能向谁索赔，那么张某是否具备向B航空公司索赔的权利呢？张某委托A物流公司运输其货物，A物流公司又委托B航空公司运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张某应向A物流公司索赔，A物流公司赔付后，可以向B航空公司索赔。

张某认为，A物流公司与B航空公司不是委托运输的合同关系，而是代理关系，所以张某还是可以直接向B航空公司索赔的。在此不讨论A物流公司与B航空公司是货物运输关系，还是代理关系，若是两者是货物运输关系如上述，若是代理关系的，A物流公司向张某赔偿的行为也应该是代B航空公司进行的，既然B航空公司已经（委托A物流公司）赔偿张某的损失了，那么张某自然也不能再向B航空公司索赔。

综述，张某不具备直接向B航空公司索赔的权利，那么保险公司自然也不具备代位张某向B航空公司索赔的权利。

保险公司与A物流公司签订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单，约定保险公司为A物流公司的货主提供运输保险服务，本案涉及的货物损失险，被保险人是货主张某。当发生保险事故了，张某可以要求A物流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也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但是张某的权利范围不能超过其因货物丢失而受到的损失。

本案中张某从A物流公司处获赔10万元，足额受偿，根据损失填平原则，已经丧失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保险公司向A物流公司支付的9万元赔偿款实际是赔偿给张某的。张某丧失了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保险公司依然赔偿了，保险公司的行为明显不恰当。保险公司有权从应付保险金中扣除被保险人已经取得的赔偿金额，若张某并未足额受偿，保险公司支付剩余部分损失是可以的，但本案中张某已经足额受偿，保险公司再支付确实不当。

法院判决认为保险公司向B航空公司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对于保险公司要求B航空公司支付赔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启示

本案中，保险公司起诉策略错误，如上述张某不具备直接对B航空公司索赔的权利，保险公

司自然就没有代张某向B航空公司索赔的权利。保险公司给付张某的行为属于无效赔付，保险公司应向张某及A物流公司主张不当得利的返还之诉。另外假定A物流公司并未赔付，保险公司赔付张某的行为是合理正当的，保险公司确实能取得代位求偿权，但是其求偿的对象不是B航空公司，而应是A物流公司（张某的合同相对方）或者盗窃者（实际侵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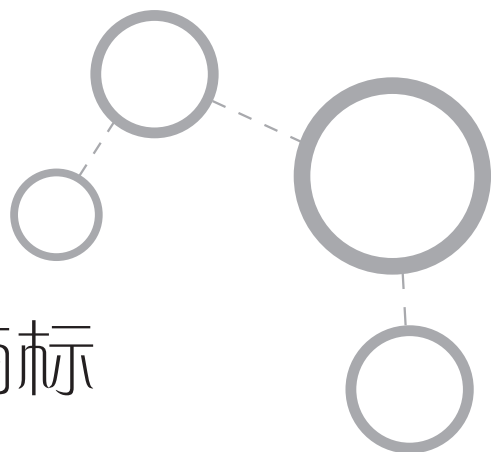
本案中，保险公司索赔的金额也经不起推敲。核损金额是货主单方面主张，并没有相关发票等证明，核损金额是10万元，与保险公司协商后赔付9万元，这依据又是什么。对此被告是可以主张第三方鉴定损失金额的，但实际上由于缺乏多种单据，丢失货物的金额是很难确定的。故被保险人要注意保留提供相关货物价值的凭证，以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那么A物流公司又能如何维护自身权益呢？本案是A物流公司为货主张某购买的货物损失险，是以运输过程中的数码相机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为货主张某，而非A物流公司，所以张某可以向A物流公司索赔，也可以向保险公司要求支付保险金，保险公司合理向张某支付保险金后，也可以向A物流公司索赔，归根到底，A物流公司还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和风险的。

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货主依据其对运输中的货物所有权具有保险利益，货物发生损失，货主就会有直接经济损失，货物安全抵达，货主可以出卖获利。

承运人对货物的所有权不具备保险利益，但由于货物受损以后承运人依照相关法律以及运输契约（如上述）应当承担一定的经济赔偿责任，如果货物安全完好抵达目的地，承运人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所有承运人对货物运输的安全是具有保险利益的，承运人可以为自身购买物流责任保险保障自身权益。

实践中有的物流公司也会以自己作为被保险人购买货物损失险，理论上说，物流公司对运输货物损失不具备保险利益，故不能购买货物损失险，但实践中如果物流公司以自己为被保险人购买了货物损失险，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7条“仓储保管人对被保管货物具有保险利益，其投保财产损失险，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以投保人不享有保险利益为由要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可见物流公司还是能获得赔偿的。



“稻香村”的典型商标 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分析

文 深圳市宝安区司法局公证律师管理科 林涌新
广东万勤律师事务所 倪世斌律师

十八大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大命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的指导方针，将知识产权工作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为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普及，提升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结合我国国情，迎接今年第15个“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全国各地开展了主题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 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知识产权宣传周。本期文章将就2014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中一起涉及消费者耳熟能详品牌中华老字号“稻香村”的典型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件，为大家分析此案件中的关键法律问题。



基本案情

2006年7月18日，苏州稻香村公司申请注册第5485873号商标（被异议商标，由文字“稻香村”与扇形边框组成的组合商标，参见图一），该商标指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的面包、糕点、年糕等。在初审公告期内，北京稻香村公司提出异议申请。商标局裁定异议理由不成立，被异议商标予以核准注册。北京稻香村公司不服，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2013年4月2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商评字(2013)第9277号《关于第5485873号“稻香村及图”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以被异议商标与北京稻香村公司引证商标第1011610号商标（引证商标，为手写体“稻香村”文字商标，参见图二）构成“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为由，对被异议商标不予核准注册。苏州稻香村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3）一中知行初字第370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3)第9277号裁定。苏州稻香村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4）高行终字第110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苏州稻香村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4）知行字第85号行政裁定书，裁

定驳回苏州稻香村公司的再审申请。至此，本案尘埃落定。

争议焦点

本案是一起涉及到中华老字号的典型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件，争议焦点为本案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是否符合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下文中《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经2013年修正后改为第三十条）。在进行审查时应全面考虑两公司的发展历史、两在先注册商标和引证商标的实际使用状况、知名度以及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两在先注册商标本身的近似程度等相关因素，进而判断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是否构成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相同或者近似商标。

发展历史

本案两当事人具有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苏州稻香村公司的关联企业在北京稻香村公司的在先公司，均成立于80年代，在公司变迁或者改制的过程中，均保持了“稻香村”的字号，且在第30类商品上各自注册了两在先注册商标和引证商标，两家公司通过多年经营已经形成了各自的消费群体及市场认知，同时经长期使用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市场划分及稳定的市场秩序。关于苏州稻香村公司和北京稻香村公司的发展历史，下文简单介绍。

苏州稻香村公司于2004年3月成立，由苏州稻香村食品厂、保定新亚公司、北京新亚趣香食品有限公司投资成立，并于2004年11月14日受让取得第184905号、第352997号（两在先注册商标，均由文字“稻香村”、字母“DXC”及图构成的组合商标，参见图三）商标，该两在先注册商标分别于1983年7月5日和1989年6月30日由保定市稻香村食品厂获准注册，核定使用商品分别为第30类的饼干、果子面包、糕点。2004年，商务部曾经

给苏州稻香村食品厂注册商标“禾”颁发“中华老字号”证书。

北京稻香村公司是第1011610号商标（引证商标，文字商标“稻香村”，参见图二）的权利人，该引证商标于1997年5月21日获准注册，申请注册人为北京稻香村食品集团，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的糕点、面包、年糕、粽子等。2006年7月31日经商标局核准，第1011610号商标注册人名义变更为北京稻香村公司。

法律分析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评判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是否构成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相同或者近似商标。

关于苏州稻香村公司、北京稻香村公司的发展历史、两在先注册商标和引证商标的实际使用状况、知名度评判

苏州稻香村公司两在先注册商标虽早于北京稻香村公司引证商标获准注册，由保定市稻香村食品厂在糕点等商品上使用，并于1996年被评为河北省著名商标，具有一定知名度，但自1996年以来该两商标几经转让，直至2004年转让至苏州稻香村公司名下，在长达八年多时间里，频发变动的权利人并没有通过使用使该两商标提升了知名度。虽然苏州稻香村公司于2004年11月14受让该两商标后，该两商标的权利人、使用人趋于稳定，苏州稻香村公司也通过其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该两商标的知名度，但距被异议商标申请注册日仅有一年多时间，且苏州稻香村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大多发生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日之后，不能证明该两在先注册商标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日前已获得较高知名度。同时，如原审法院论述，根据商务部对中华老字号的定义，中华老字号注重的是悠久历史、技艺和服务的传承，苏州稻香村公司至起诉时成立不足十年，且苏州稻香村食品厂仍存

续并实际经营，苏州稻香村公司与苏州稻香村食品厂仅为投资关联关系，其主张实际继承中华老字号苏州稻香村食品厂的产品声誉与商业信誉，主张被异议商标是对其在先商标商誉的延续，证据不足。

反观北京稻香村公司及其前身自1983年成立以来，经过多年持续宣传和使用，其引证商标已具备较高知名度。1993年10月，北京稻香村南味食品店被原国内贸易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2006年，北京稻香村公司（注册商标“稻香村”）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北京稻香村公司“稻香村”商标多次获得北京著名品牌，北京稻香村公司也多次获得行业荣誉。据此可以判断，北京稻香村公司的引证商标在糕点、面包、年糕、粽子等商品上对“稻香村”商标的实际使用，已使之具有较高知名度，形成了消费群体和市场格局。

关于被异议商标与两在先注册商标以及引证商标标识本身的近似程度评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判断，被异议商标第5485873号商标，是由文字“稻香村”与扇形边框组成的组合商标（参见图一），而扇形边框只是起到装饰作用，其显著部分为文字“稻香村”。苏州稻香村公司的第184905号、第352997号在先注册商标，是由文字“稻香村”、字母“DXC”及图构成的组合商标（参见图三）。北京稻香村公司第1011610号商标引证商标，为手写体“稻香村”文字商标（参见图二）。通过整体视觉效果及构成要素组合对比可得出，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更为近似，反而与两在先注册商标有一定差异。从公众一般注意力观察，更会认为被异议商标系引证商标的延续或存在关联性而非两在先注册商标标识的延续。

关于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商品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是否构成类似商品的评判

判断是否为类似商品，不应该只是机械的套用原核定使用商品范围进行对比评价，而应该综合考虑商品在实际市场生产、销售等关联性。北京稻香村公司以及前身自1983年成立，基于历史原因，虽其未在糕点等商品上注册商标，但对比引证商标与被异议商标，首先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商品中的年糕与引证商标指定使用商品年糕为相同商品；其次被异议商标除了饼干、糕点及面包已体现在苏州稻香村公司的第184905号、第352997号在先注册商标上，其他商品并未获得在先权利，无正当权利作为在先注册的依据；再次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谷类制品、面粉制品、含淀粉食品商品，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馅饼、烘馅饼（意大利式）等在功能、用途、销售渠道及消费对象等均关系密切，

且经过多年持续宣传和实际使用，北京稻香村公司的引证商标在糕点、面包、年糕、粽子等商品上已具有较高知名度，应当认定为类似商品。

综述，一、二审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综合评判苏州稻香村公司与北京稻香村公司各自历史背景及现状，查明了两在先注册商标和引证商标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注册日之前的实际使用情况和知名度等事实，以及判定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标识更为相似而与在先注册商标标识有一定差异等综合因素，认定如果被异议商标获得注册并与引证商标在上述类似商品上并存，容易使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同时也将打破两家公司已经形成的市场秩序，增加市场及相关公众混淆的可能性，不利于企业的正常发展、公平竞争，据此，驳回了苏州稻香村公司的相关诉求，维持了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对被异议商标不予核准注册的复审裁定。

律师提示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截至2015年3月底，中国累计商标注册申请量1610.1万件，商标有效注册量898.2万件，伴随而来的商标异议、复审以及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必将大幅增加。法院在审查本案时并没有脱离历史简单的审批，而是全面考虑双方的历史发展、现实状况等客观因素，且审判中进一步就商标经实际使用产生知名度等“商誉延续”方面进行了关于混淆性判断的论述，较好的体现了北京高院于2014年1月发布的《关于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审理指南》的精神，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这对日后涉及基础商标与商誉延续评判、《商标法》第二十八条具体适用原则以及实际审判中关于混淆误认的判断问题等方面均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及指导作用，值得我们关注。

附本文中涉及的商标标识：

下为图一，苏州稻香村公司被异议商标，由文字“稻香村”与扇形边框组成的组合商标



下为图二，北京稻香村公司引证商标，手写体“稻香村”文字商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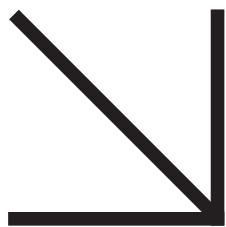
下为图三，苏州稻香村公司在先注册商标，均由文字“稻香村”、字母“DXC”及图构成的组合商标



PROFILE | 人物

近年来，深圳律师人大代表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提交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提案，因具有较高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少提案被深圳市人大立法部门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决策时采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据了解，深圳目前有8000余名执业律师，500余名人大代表，而像黄亚英作为深圳大学法学院院长，又身兼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和律师等多重身份的法学研究者，在深圳屈指可数。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来，他用实际行动和法律人的责任感，践行着法治精神。



法治的践行者

文 特约记者 惠珍珍



黄亚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经济的腾飞吸引了全世界的瞩目，这背后则是深圳特区立法权和较大市立法权的法制保障。如今，在深圳各界优秀法律人士齐心协力的推动和完善下，深圳正向着一流法治城市稳步迈进。

近年来，深圳律师人大代表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提交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提案，因具有较高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少提案被深圳市人大立法部门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决策时采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据了解，深圳目前有8000余名执业律师，500余名人大代表，而像黄亚英作为深圳大学法学院院长，又身兼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和律师等多重身份的法学研究者，在深圳屈指可数。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来，他用实际行动和法律人的责任感，践行着法治精神。

法律知识的传播者

在深圳法学界，黄亚英可谓是一位优秀的领路人。

“我的本职工作是教学研究。”20多年的教学历程，黄亚英将法学向蒲公英一样播撒在各个角落，传授给每一个热爱法律学子。

2003年，黄亚英作为学术带头人被引进深圳大学法学院任教，先后主讲过国际私法、海商法、国际经贸法案例、国际公法等多门课程，通过6年耕耘成为深圳大学法学院的院长。目前，他还兼任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以促进与港澳高校的专业交流。

担任深圳大学法学院院长后，他为深圳大学法学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深圳大学先后获得广东省法学名牌专业和特色专业，法学院获得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并新增5个二级硕士点，深圳大学法学学科获得广东省法学一级优势重点学科，并开辟了法律硕士（法学）、法律硕士（非法学）、在职法律硕士（JM）等专业硕士点。至今，黄亚英已连续招收和培养十多届国际法硕士研究生，其中已有多位正在攻读或已经获得国内外著名学府的博士学位。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黄亚英始终坚持着法学研究。多年来，他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独著或主编《国际商事仲裁实务研究与操作推演》、《商事仲裁前沿理论与案例》、《国际私法》、《中国审判实务大辞典》等多部学术著作。

身兼律师的使命

在研究生毕业那一年，黄亚英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获取了律师资格，两年后成为一名兼职律师。

“在律师制度恢复之初，法律专业人才稀缺，于是国家创立了兼职律师制度，1980年的《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取得律师资格的人员不能脱离本职的，可以担任兼职律师，作为专职律师的重要补充。1996年11月司法部发布的《兼职从事律师职业人员管理办法》对兼职律师制度作了重要调整，将其人员范围限定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法学院校（系）、法学研究单位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人员。”当问及为何想做兼职律师时，黄亚英回忆到，一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利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法律服务，二是为了实践。

“学习和研究法律是不可没有案例的。脱离

了案例的法学研究，无异于喝酒缺少了下酒菜，这酒也会变得索然无味。”在黄亚英看来，法学是研究法律的学科，而法律具有规范行为和处理纠纷两大基本功能，这两大功能都需要通过实际发生的各类案件来承载和体现。因此案例是活的法律，是行进中的法律，法律只有适用于具体案件才能彰显它的具体价值和作用。

2004年，黄亚英以兼职律师的身份，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代理了中国某铁合金厂与比利时某公司在全球最著名的巴黎国际商会仲裁院（ICC）的国际货物买卖纠纷仲裁案，获得全面胜诉，在当时影响很大。

该案的申请方中国某铁合金厂与作为卖方的被申请人比利时公司于2003年9月29日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中国工厂向比利时公司购买10000公吨阿尔巴尼亚铬矿，比利时公司分两批发运货物。而其中一批货物经抽样检验不合格，中国工厂于2004年2月用传真通知比利时公司拒绝接受该批货物，并要求返还所支付货款。比利时公司于2004年5月去函向中国工厂主张供货符合合同要求，在中国卸下的货物的质量与AHK检验证书不符，是由于中国工厂不能解释的原因造成的，比利时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经多次协商无果后，中国工厂于2004年7月将这起纠纷提交由巴黎国际商会仲裁。

在该案中，双方针对案件实体争议事项的法律适用、卖方交货是否违约及本案买方能否解除合同、术语的解释和适用、买方是否在合理期限内发出解除合同的有效通知、接受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和收货与接受货物和退货的关系等这些案件争议焦点问题做出了激烈辩护。仲裁庭最终裁决申请方胜诉，中国工厂的八项仲裁请求全部得到支持。

此后，该案也成为黄亚英在国际经贸法授课过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听你讲课的学生，以后很可能成为律师、法官，甚至是授课老师、法学研究者，自己亲身经历的实战经验、庭审中的一些小细节以及心理活动，都可能成为他们很宝贵的‘前车之鉴’，这是很吸引他们的案例。”黄亚英说道。

法规决策的推动者

对黄亚英来说，兼职律师给他带来的“收获”，远不止这些。

虽然黄亚英的本职工作是法学研究，但多年的兼职律师经历让他能深刻体会到执业律师们的尴尬，真切感受到执业律师们的困惑。早在2009年，黄亚英就开始通过媒体等多个渠道对律师会见难等涉及律师权利的问题进行呼吁，但这项工作的推动并不容易。2010年，黄亚英当选为深圳市第五届人大代表、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深圳市五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这一全新的身份赋予了黄亚英更多的责任。

在2010年当选人大代表后，黄亚英等人开始通过人大会议等方式为律师权益进行呼吁。于2011年至2013年先后提出了《关于简化律师工商查询手续的建议》、《关于推进〈律师法〉实施，解决律师“会见难”问题的建议》、《关于提请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充分保障律师调查权的建议》、《关于发挥律师在解决信访案件法律问题中的重要作用的建议》等。

经过深圳市律师协会与各级法院的多次磋商，2013年11月，律师“绿色通道”率先在福田法院开通，律师进出法院可凭借电子执业证实现自助登记，无需安检。2015年5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若干规定》，采取17项具体措施，切实保障律师执业

权利。由此，律师“绿色通道”在我市各级法院全面铺开。

“这一举措使得律师的尊严得到了尊重，我很欣慰看到这项改革。”黄亚英认为，律师是法律的第一道“屏障”，法律应当对律师权利进行保障。

在常年的兼职律师经历中，黄亚英发现商事登记制度存在着不少弊端，企业注册注销等行政审批手续繁琐，严重影响了深圳经济的发展。身为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黄亚英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一想法后，竟和市场监管部门“一拍即合”，于是开始共同研究此项改革。《关于深圳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调研报告》以及《关于深圳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立法建议在他与多位法律界人士共同研究下“破茧而出”。2010年12月，深圳市市场监管局针对该《调研报告》以及《实施方案》立法建议举办了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课题研讨会，黄亚英应邀参加。2013年3月1日，深圳率先全国启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一年后，该项改革在全国全面实施。这项改革一度被视为“深圳30年来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机构改革”。

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任职多年来，黄亚英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涉及到法治的方方面面，积极



律师“绿色通道”率先在福田法院开通



律师验证电子执业证后进入“绿色通道”

主动为深圳建设一流法治城市建言献策，同时也对深圳的未来满怀信心和期待。近日，黄亚英参与深圳公正机构改革的进程中，这对于推进政府工作效率、提高政府公信力将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黄亚英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这个城市就像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人，处在人生未来发展的历史转折时期，希望更多的青年人参与到法治建设中来，争做法治社会的践行者，共同为深圳法治建设尽一份力。



【延伸阅读】

目前，全国有1343名律师当选人大代表，占律师总数的5.8‰，而深圳律师人大代表仅占律师总数的2.07‰，且深圳律师人数正以每年近1000人的速度增长，深圳律师人大代表比例明显偏低。律师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四中全会又赋予律师新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律师理应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深圳律协长期以来积极开展律师参政议政工作，鼓励律师多渠道参政议政，就如何正确履职及在两会中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提案开展研讨会，提高律师参政议政能力。深圳律师队伍参政议政意识不断增强，律师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党政机关各项活动和培训，认真履行职责，参与法治建设，为党委、政府献计献策；开展公益法律服务，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近年来，深圳律师多次被委以司法评判工作重任，不仅专业实力得到验证，在促进司法公正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律师作为独立第三方，不仅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也有利于通过立法和司法监督进一步推进法律的正确实施。因此，一定程度上提高律师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委员比例，进一步拓宽律师参与司法体制改革渠道，无论是对于推动人大立法工作，还是促进深圳法治城市建设

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深圳律师在参政议政工作中具备独特的专业优势和社会优势，律师中的各级人大代表所提议案、建议不仅数量和质量较高于其他代表的平均水平，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使得提案议案被决策执行部门采纳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代表。

近几年来，深圳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年向省、市“两会”递交提案、议案、建议逾百件，多项提案获重视，并获评优秀提案奖。如深圳律师领衔提出的《关于制定广东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立法的建议》被列入省人大当年度一号议案，并纳入立法计划，有力推动了《广东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的制定出台。律师代表针对深圳众多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混乱的现状提出的《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建议》议案，对完善和规范我市流动人口管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2012年，广东省律协公布的全省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优秀议案、建议、提案评选活动结果，我市八名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获奖，占获奖名额八分之一。

今年我市共20名律师当选新一届市党代表、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其中，市党代表2名，市人大代表11名，市政协委员7名。与此同时，我市24位律师获聘深圳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法律助理，占法律助理人数的50%。

深圳市律师协会2015年上半年工作亮点回顾

“

半年来，深圳市律师协会在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坚持“办实事、求突破、重服务、谋发展”的工作理念，务实勤勉，开拓创新，认真履行职责，以改革创新为抓手，进一步推进深圳律师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建设，促进深圳律师业稳健发展。回顾九届深圳律协2015年度上半年工作，成果丰硕，亮点纷呈。

”

NO.1 紧扣时代脉搏 加快深圳律师国际化发展



3月31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视察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他充分肯定了联营所在法律服务机制方面的创新与尝试，鼓励联营所在自贸区合作版图中，充分发挥深港合作优势，创新法律服务功能，推动法律服务工作与国际接轨，助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贯彻落实。

3月31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视察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他充分肯定了联营所在法律服务机制方面的创新与尝试，鼓励联营所在自贸区合作版图中，充分发挥深港合作优势，创新法律服务功能，推动法律服务工作与国际接轨，助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贯彻落实。

我会应英国司法部和英格兰及威尔士律师会的邀请，派员参加英国司法部举办的全球法律峰会（Global Law Summit），进一步拓宽了深圳律师对外交流的平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贯彻落实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建设为深圳律师业国际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此，我会开设了涉外法律服务方向的培训班，参与联合举办“中国自贸区法律服务业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加强与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多地律师开展交流与合作，助推深圳律师打破国际化发展瓶颈。同时，我会还积极推进深圳国际律师学院的筹建工作。

NO.2 参与司法改革 深化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为深入贯彻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召开法官与律师座谈会。我会高树会长参会，并就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构建良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提高司法公信力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积极回应。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在硬件设施上为律师履职提供方便，充分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搭建法官与律师的良性互动交流平台，促进构建新型职业共同体。

在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我会积极与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开展多方交流，深入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若干规定》，规定从充分尊重律师、切实保障律师法定权利、为律师执业提供便利、

畅通与律师沟通渠道、严格责任追究等5大方面，17项具体措施进行了细致规定。市司法局与我会联合出台《关于规范律师在法院诉讼行为及律师与法官关系的指导意见》，规范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关系。

同时，我市15名律师受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窗口监督员；我会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进行座谈，就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建设，提高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能力，进行交流与沟通；我会积极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建立律师参与案件评审、网上立案和涉诉信访案件化解工作机制进行研讨。



NO.3 发挥专业优势 服务深圳一流法治城市建设

4月24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调研基地在我会正式成立。立法调研基地由我会负责日常管理并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领导，主要职责包括接受市人大常委会各部门委托，开展立法调研、评估、论证等工作；对市人大常委会法规草案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等。立法调研基地的建立为我市律师深入参与法律实践、践行法律人的社会责任拓宽了渠道。

我会还与龙岗区司法局磋商建立中国法治创新服务基地，旨在培育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开发、孵化新型法律服务产品和研究推动各类法治社会创新体系建设等，全力助推龙岗建成中国法治

创新高地，助推深圳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目前此项工作的选址已经初步完成，正在积极推进过程中。

今年我市先后有20名律师当选新一届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也将代表深圳8000余名律师以最高的热情和专业的精神参政议政，为深圳建设一流法治城市贡献智慧和力量。



NO.4 引领发展方向 以制度建设为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3月28日，深圳市第九届律师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深圳市委党校礼堂举行，全市近400名代表参加。

大会通过了《第九届理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第五届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通报了2014年第九届律师代表大会提案办理情况，进一步明确2015年深圳律师业发展方向。

作为依法成立的行业自律管理组织，律师协会肩负着引领律师业发展方向、维护律师业的合法权益、提升律师专业素养、加强律师自律管理的重要使命。随着深圳律师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律师行业的不断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行业纪律工作，结合目前纪律管理工作实际及我市律师行业发展情况，今年1月，我会专门成立修改小组，对《纪律委员会工作规则》、《会员违规行为处分细则》、《投诉案件立案管理办法》、《纪律部工作规则》等9个规则进行完善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投诉案件的办案程序和处分细则实体内容，以适应新时期律师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指引深圳律师业进一步做强做大。

NO.5 健全培训体系 保障深圳律师业可持续发展

上半年，由我会举办的第四期青年律师研修班、第五期青年律师研修班、中小型律师事务所主任管理能力研修班、团队带头人能力提升训练营、行业领军人才培训班五个培训班圆满结业。同时，我会还定期举办“金钥匙”律师职业技能培训、“金种子”律师业务创新培训和法律大讲堂，进一步丰富“8+1”职业培训体系内涵，实现培训内容全覆盖，惠及全体律师。

专业水准和执业技能是律师安身立命之本，是律师行业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原动力。创新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岗前培训模式，通过小班制培训、开展模拟法庭活动等，进一步提升申请律师执业人员业务技巧和实操技能，为行业把好入门关，输送合格后备人才；邀请最高

人民法院法官、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法官分别讲授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修订的理解与适用、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环境下执行案件若干问题，加强律师对新法律法规的理解与适用；举办首届律师业务创新大赛，向全市律师征集律师新服务模式作品和新业务方案作品，激励广大律师不断创新法律服务产品，以适应逐渐多变、复杂的法律服务需求。



NO.6 夯实行业基础 打造纪律严明的律师队伍



加强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和管理，强化律师执业纪律教育和自律管理，1月，针对律师兼职行为的投诉，我会及时通过深圳律师网发布执业风险提示函；发布通知要求律师自觉遵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出庭服装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塑造律师良好形

象，增强律师执业责任感；引导我市律师规范执业，有效防范律师执业风险，并在宝安区、龙岗区开展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培训系列讲座，结合典型违规案例和执业中出现的

问题，加强律师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对本市法官配偶、子女中的律师执业人员的职业纪律约束，由律师本人签署《诚信执业承诺书》，保证不在自己配偶或直系亲属任职所在法院辖区内代理诉讼案件；加强理事及监事对纪律工作的参与度及监督，增加理事、监事为当然的听证评议团候选人员。

NO.7 发挥职能作用 参与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

2015年6月15日，市司法局与我会联合召开“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推进会”，就进一步做好深圳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进行部署。我会组织全市律师事务所深入推进“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积极配合各区街道、社区，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切实推进“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为我市社会基层法治建设提供专业支持。目前，我市律师已经全面进驻福田、南山、罗湖、宝安、龙岗、龙华新区、坪山新区等多个街道和上百个社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了解决河源律师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力量不足的问题，根据省厅的统一部署，选拔了55名律师到河源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

根据深圳市民政局公布的具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和购买服务资质的市级社会组织目录，我会成为深圳市第二批具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资质的市级社会组织之一。

NO.8 畅通宣传渠道 传递法情法意正能量



为加大宣传力度，多渠道发声，不断加强与媒体之间的联络，创建“媒体交流”微信群，与深圳特区报、法制日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晚报、晶报、广州日报、深圳卫视及深圳电台等10余家媒体达成友好关系，为

及时公布协会工作动态、深化与媒体合作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深圳电台898频率沟通，选派律师担任其898频率“明白说法”栏目嘉宾；针对当下二手房反价违约热点问题，6月11日，组织召开圆桌会议，获得了近十家媒体单位的高度关注与大量报道，为购房人提供了有效法律风险防范措施；及时有效报道我会工作，同时不断挖掘协会工作，加强综合信息的梳理总结，向市司法局、市委、省律协报送。



秋 天

文 自由撰稿人 戴璐

这是秋天。

这是成熟了多少世纪，

却始终还在生死轮回的秋天。

我不知道树叶和野草在西风的歌声中是怎样翩然起舞；

不知道归雁和流云在天地喃喃的唇间，轻捷还是默立；

不知道大山苍凉的脸孔漠然了多少枯荣衰盛；

不知道那田野上的阡陌，有多少是岁月吉祥的图案。

寒蝉凄切，泣声挽留魂之所系的远逝跫音；

悲风愁雨，抵挡不住血染霜叶的浅浅微笑。

哦！假如有了土地、有了阳光、有了爱，

有了生息和繁衍，

唯独没有人类，那秋天将是怎样的沉寂季节啊！

承受着死亡与新生的更换交替，

承受着古壁画前逆光的灵魂，

于回音壁似的天空泪洒缄默的土地。

这是成熟了多少世纪，

却始终还在生死轮回的秋天啊！

这是秋天。

